

REMEMBRANCE

記憶

DOMESTIC EDITION

国内版

Irregular Publication

不定期出刊

追忆似水年华
汇聚天下文章
建立交流平台



《记忆》272 期

方延曦专辑（二）

方延曦 古稀回望人生路

第二卷 文革狂涛冲击中的囚徒命运

第一章 1966 年文化大革命风暴降临

第二章 我与颂平不打不相识

第三章 “红八月”家被抄离京“大串连”

第四章 1966 年底大寨之行与我的黄山之恋

第五章 毛泽东亲批“北师大军训经验”压垮造反兵团

【附录一】 在北师大搞军训的部队是如何支持左派的

【附录二】 人民日报社论：军政训练好

第六章 1967 年武汉“720 事件”与 81 横渡长江

【附录三】 文革武汉惨案：造反派组织横渡长江数百人丧生

第七章 “王关林”垮台、造反兵团恢复活动与北师大“97 事件”

第八章 兵团“倒谢”与“712 事件”谭厚兰放火烧楼

第九章 “清查 516”与北师大的“一支一直”

第十章 1971 年北师大“426 事件”造反兵团被一网打尽

【附录四】 就 1971 年北师大“426 事件”给周恩来总理的信

【附录五】 为北师大“426 事件”平反给中央领导同志的信

【附录六】 我们不能再沉默

【附录七】 敦促北京市委、吴德同志为北师大“426 事件”平反的公开信

【附录八】 关于北师大“426 事件”的报告

【专稿】



作者简介

方延曦，祖籍安徽，1946 年 9 月 12 日生于辽宁省沈阳市，1948 年迁入北平，1969 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在 1966 年开始的文化革命中，因反对“四人帮”及其帮凶遭到长期迫害，被打成“反革命”。1979 年平反后供职于中国共青团中央机关刊中国青年杂志社，历任编辑、副主编、主编、副总编辑。1992 年辞去公职，致力于教育软件研发推广及学前教育机构创办。曾获多项专利及国家有关部门多种奖项。

古稀回望人生路

方延曦

第二卷 文革狂涛冲击中的囚徒命运

第一章 1966 年文化大革命风暴降临

就在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前，伴随着日益高涨的教育革命声浪，我们在学校里还参加了学习之外的一些活动。

一项是开挖京密引水渠，现在北京人喝的水就是从这条渠从密云水库引过来的。正值冬天，天气冷得要命，劳动量特别大，凡在农村劳动过的人都知道，挖河是个什么样的活儿。活儿累就吃得多，好在当时困难时期已过，还不至于饿肚子。但因为没有帽子，我的耳朵冻伤化了脓，涂了紫药水后，阳光一照，两个耳朵金光闪闪，看上去挺滑稽。

另一项活动是下连当兵，不记得去的是哪个部队了。说是当兵，其实连军装都没有，还不如现在一些中学生的军训。但是训练的科目，如射击、刺杀、投弹等一样不少。我当时真的下决心苦练，几项成绩都不错，射击，半自动步枪 4 发子弹打了 38 环，优秀；投弹，

40米，稍差了一些；练匍匐前进，衣服都磨烂了也毫不在乎。部队生活印象最深的就是一个字——“快”，干什么都得快。一个是夜里紧急集合，动作快是必须的，否则就可能闹得狼狈不堪。吃饭也得快，慢慢腾腾集合哨一响你就可能吃不饱。我吃饭特别快，一般只要几分钟，就是那时候练出来的。还有一件事，那就是行军拉练去了董存瑞的家乡——河北省隆化县的一个小山村，看上去十分贫困。

1965年11月，姚文元批判吴晗《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文科学生自然都要参加“革命大批判”，每个人无一例外都要写文章在所谓“大事大非”面前表态，正课基本上就停下来了。到1966年5月，北京市委的问题又出来了，什么“三家村”，什么《燕山夜话》，都遭到批判，文艺界的头面人物一个个被揪出来，从批判“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上升到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彭真等党内一批高级干部被打成“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公开揭露出来，……以著名的“516通知”在党内下达为标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终于排山倒海般地降临了！

1966年5月25日，北大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等7位教师贴出一张大字报，这张被毛泽东赞誉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其矛头是指向北大党委书记兼北大校长陆平及北京市委的。消息很快传到北师大等院校，一时因为看不清形势，人们都处于观望状态。6月1日晚，毛泽东指示全文广播聂等的大字报，这下子北京的大学炸开了锅。6月2日夜里师大政教系调干学生谭厚兰从红旗杂志社悄悄回到师大，贴出了师大第一张反校党委书记程今吾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是谭厚兰在林杰的授意与指导下写的。调干生谭厚兰原是湖南长沙10中的教师，在师大政教系学习已届毕业，1965年底姚文元批判吴晗文章出来后借调到《红旗》杂志社协助查资料，因此与当时在《红旗》工作的林杰相识。林杰原是温州军分区的一个参谋，后在北师大历史系学习，毕业后分到《红旗》杂志社工作，与后来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关锋等结成一伙，上边还有更大的人物康生暗中支持。这样说绝非臆测，而是有康生本人后来在北师大万人大会上的亲口说法为证。

6月6日，改组后的北京市委给北师大派来了工作组，以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孙友余为组长的工作组到达北师大时已是晚上，全校师生聚在师大主楼北门的广场上，欢迎场面极其热烈，给人的感觉是，革命群众可算是有了主心骨和领路人啦。

工作组进校后开始领导师大的文化革命，宣布了不少政策规定，用毛泽东后来批判工作组的话说，就是制订了不少条条框框，意在束缚革命群众的手脚，“把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打下去”。其实我们当时并不知道在派工作组的问题上毛与刘有什么分歧，过去一说搞运动不都是以派工作组来“加强党的领导”吗？谁也想不到“派工作组”竟是刘的一大罪状，而且是毛把刘打下去的一条导火线。文革后有研究著作说，文革开始前毛有意离开北京躲到南方，布好罗网，等待刘自己钻进去。

工作组的做法引起了一些激进学生的不满，认为工作组是要压制群众革命。需要指出的一个现象是，文革开始前后中共高层人物被揪出来打倒的事件不断发生，这让一些敏感的青年学生产生一种感觉：阶级斗争真是太复杂了啊，是不是还有更大的人物在后边？于是对工作组开始产生怀疑。6月20日一早，师大数学系学生高树奎等贴出大字报《孙友余要把师大运动引向何方？》。还有一张大字报转引人民日报一张大字报，说贺龙“大黑帮”曾经在北师大驻有两个营的部队，目的是要搞“二月兵变”。

孙友余反应很快，当天上午即发表广播讲话，特别驳斥了关于所谓“政变”的大字报，说大字报的作者“别有用心”，目的是“要流人民的血，流解放军的血”。孙友余讲话后，群众立刻分成反工作组与保工作组两派，后者人数当然远远多于前者，因为历史的阴影起了作用，不少人想起了1957年“反右派运动”时提意见的学生被说成“反党”的情景，于是反工作组的学生在各自的班里就成了被批斗的对象。然而还是有人顶风而上。

6月23日从一大早起，我就没有见到同班的女同学颂平，往常这时候我们都要聚在一起讨论问题，正奇怪颂平跑哪儿去了呢，孙友余讲话后的中午有同学匆匆跑来神色紧张地说：快去看看，颂平正挨斗呢！跟着来人跑到北饭厅北面，看到颂平被几个女生围着一块站在一个大饭桌上，底下还有一大群女生，个个高举手臂，义愤填膺地高喊“打倒反革

命分子王颂平！”等口号。在颂平身后的墙上贴着一张题为《孙友余为何如此恐慌？》的大字报，原来这是颂平与同班同学李先华等一道署名贴出的。只见颂平站在台子上，身材高瘦，紧闭双唇，因为贫血面色显得苍白，左右躲闪着几乎打到身上的拳头。我站在人群外边看到这一幕，一方面为那些据说是生物系的一群女同学感到悲哀，一方面对颂平的勇敢感到钦佩，当时的一个强烈印象是：这不就是刘胡兰吗？

我们从小受的教育都是革命英雄主义教育，文学作品中、特别是电影中的英雄形象对我们这些“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青少年影响巨大。这些英雄有中国的，也有苏联的。苏联的有保尔·柯察金、卓娅等，中国的有解放战争中手托炸药包，高喊“为了新中国，前进！”与敌人碉堡同归于尽的董存瑞，有在朝鲜战争中用胸膛堵住敌人枪口的黄继光，有为了不暴露潜伏目标咬紧牙关一声不吭活活让烈火烧死的邱少云，有身陷魔窟受尽酷刑坚贞不屈的女英雄江姐，还有一位少年女英雄、年仅15岁即牺牲在敌人铡刀下的刘胡兰，毛泽东专门为她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在她牺牲的山西省文水县云周西村，她的故乡，每逢清明，一群群少先队员都要高举红旗，手捧鲜花，来到她的墓前凭吊她的英灵。她的白色大理石雕像矗立在墓前，昂首挺胸，神情坚毅，短发飘飞，在那些渴望建功立业的青少年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崇高形象。

苏联英雄主要是通过苏联小说与电影认识的，最著名的当然是双目失明的奥斯特洛夫斯基，他的自传体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中国家喻户晓，小说中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的一段话简直成了所有中国青少年的座右铭，这段话是这样说的：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是应该这样渡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当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可以说，我的一生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从我读这本书到今天，50多年过去了，我仍然能够几乎一字不差地写出这段话，可见它对于我们的影响有多深。正如文革中流行的一句话，叫已经“融化在血液中”。半个多世纪过去，人生经历了多少挫折，我不仅仍然清晰地记得同名苏联电影中保尔那面孔如青

铜雕像般坚毅的形象，我也丝毫不后悔自己所做的一切。也许有人说保尔是共产党以共产主义教义塑造出的英雄，他为之奋斗的事业已经被历史证明是虚妄的，谈不上什么崇高壮丽，但我仍然坚持认为，人类永远需要崇高，保尔身上体现的那种勇敢奋斗、永不屈服的精神，使他无愧于“大写的人”的称号，永远值得后人景仰与效法。

反工作组的学生在其班、系里都遭到多次批斗，按照过去运动的经验，这些学生在运动后期都将被戴上“反革命”的帽子遭到严厉惩罚。全校都笼罩在一片肃杀的气氛中，谁也想不到一个多月后这形势会发生一百八十度的大逆转。

这段时间我与颂平来往密切，尽管大多数同学都躲着她害怕受牵连。对于该不该给工作组贴大字报，颂平自己一段时间里也曾感到过困惑。然而我坚信一点：颂平绝不是“反革命”。

第二章 我与颂平不打不相识

刚进北师大时我们中二(2)班共有44个学生，其中女生只有9个，颂平在当中挺显眼，一个原因是她个子高，有1.70米，白白瘦瘦的，后来知道是因为贫血及胃下垂造成的“豆芽菜”体型，另一个原因是她来自大城市上海。当时在一般人心目中有个印象，即认为凡是上海来的总好像跟资产阶级沾点边儿。女学生，穿得又比别人讲究些，难免让人联想到“小姐”这个词儿。其实这完全是时代造成的偏见。

在我与颂平还不熟时有一次碰巧赶上在一个饭桌上吃饭，那时候大学条件很差，饭厅里连凳子都没有，大家都是站在桌边吃。不知道说起什么事，颂平对另一个同学说了一句“我行我素”，我一下子想起丁玲写的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顺口说出：“莎菲女士”，颂平可能觉得我的话里有某种不敬之意，双方竟因此发生口角。还有一次，全班组织去颐和园游玩，路上行走时又发生争执，颂平说北京人怎么怎么不好，我说上海人有什么什么毛病，互相攻击一通。

若干年过去后，颂平曾回忆起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情景。那是1964年9月1日正式开学前几天，她站在校门口新生报到的地方，看见眼前走过来一个青年人，中等身材，五官清秀，身穿一件淡蓝色的衬衫，腋下夹着一本书，看上去挺潇洒。颂平说，那一刻她突然有个感觉：这个男孩子她好像在哪里见到过。有点儿像《红楼梦》的情节了，不过，那是贾宝玉第一次见到林黛玉的感觉。然而颂平言之凿凿，说她不是瞎编的。

只是我对这次见面没什么印象，因为我没留心旁观者，更不会知道旁观者中还有同班同学。颂平说，她当时也不知道是一个班的，班里同学集中见面了才知道，后来她说她当时心里有一点儿莫名的高兴。几天之后班里组织劳动，在校园里拔草。那是一处偏僻的仓库，平房间长满了半人高的荒草。颂平说她见我干活很卖力气，而且速度很快，左右开弓双手拔。当时觉得这个同学表现不错，后来知道这个同学出身不好时又觉得：他是不是故意表现自己？再后来她对我了解多了就完全改变了印象，知道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实诚，不管给谁干活，都不会偷奸耍滑。

颂平因反工作组受压被孤立那一段，倒让我们多了互相了解的机会。我知道颂平是上海市第一女中的学生，高考前坚决放弃高考，一心到新疆去劳动，为此接受过电台、报社的采访。后来上边要求“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她才很不情愿地参加了高考，尽管没有时间准备但因为平时底子好，还是考上了北师大。虽然进了大学，但始终不喜欢大学的气氛，认为不利于青年人锻炼成长，因此有段时间情绪很不稳定想退学。看起来颇有点儿“左”吧？可能是，但这是一种真诚的“左”，只能说这是那个时代在很多虽然幼稚却真诚的年轻人身上留下的印迹。文革后刘心武写的一篇小说《班主任》里有个女学生叫谢惠敏，左得真诚可爱。后来我有时候和颂平开玩笑，就叫她“谢惠敏”。颂平是团员，还担任团小组长，但是和一些非团员来往挺多，而且对出身不好的同学一点儿不歧视，反而觉得有些党员、班干部不那么顺眼，认为她们“假”。

文革前发生的跟颂平有关的一件事很能说明颂平的性格与为人。当时学校有明文规定：学生在校期间不许谈恋爱。男女同学之间来往都比较谨慎，生怕不小心惹来麻烦。可是有

一天晚上闹出了一场风波：熄灯时间已过了好久，仍不见颂平回来，同宿舍的女同学很紧张，赶快出门在校园里四处寻找，结果发现颂平与我们班的一个男同学还在谈话，可能因为一些话题谈得比较投机，竟然忘了已是深夜。当然，这件事与“恋爱”完全无关。这就是那个自言“我行我素”的颂平，自己认为对的就去做，丝毫不去顾虑什么“影响”。这样的性格在文化大革命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后来的事实证明，外表看上去很柔弱的颂平，根本不是我一开始想象的那样，是个上海的“娇”小姐，而是完全相反。

我在学校里基本上是个独来独往的人，上课去教室，下课直奔图书馆，借上一大堆书，图书馆里没座位就回宿舍看书，因此很长时间与同班女同学都不太熟。对颂平有印象是开学一个月后的一次校外活动。1964年10月，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到中国访问，有一次报告会安排在北师大的北校。北师大校址位于北京海淀区北太平庄，所谓“北校”指的是原来辅仁大学的校区，1949年前辅仁大学是著名的教会大学，在1952年院系调整时已经解散，原校区就给了北师大化学系。为什么叫“北校”？我到现在都没弄清楚，因为从地理位置讲，辅仁在师大东南方向，就在现在旅游上热得不得了的那个满清王爷和珅的恭王府西边，往北走不远就是北京著名的后海南岸。那是座建于民国时期的四面围拢的中西合璧式建筑，使用大块灰砖以磨砖对缝的传统工艺砌成的二层楼，高大的楼墙上嵌着暗红油漆的雕花小窗，楼顶覆盖有绿色的琉璃瓦，看上去十分气派。这个地方有名，还因为1946年国共谈判时它曾是军事调处执行部所在地，不少反映这一时期历史的电影中都有它那漂亮的大门楼的镜头。我们就在这座建筑的礼堂里听报告，颂平刚好就坐在我前面一排，身穿一件淡蓝底子上带白色圆点儿的短袖衬衫，梳着一个马尾巴，不停地和她旁边一个男同学小声耳语。后来知道那个男同学是中二(3)班的，印尼归国华侨，叫涂乃贤，若干年后我在香港见到了这位涂姓同学，他已成为香港知名作家，笔名陶然。

受压的经历迅速拉近了我和颂平的距离，从而互相之间了解更多。原来颂平出身工人，不过这可不是人们头脑中那种工人，她的爸爸琴棋书画、吹拉弹唱样样皆能。颂平被打成“反革命”时，其他班有她上海中学同学写大字报“揭老底”，说颂平的父亲不是工人，

是“职员”。在那个时候，出身可是个了不得的问题。听颂平自己说，她外公是宁波人确实有过产业，可是1937年日本人打进来了，“八·一三”轰炸闸北时把厂子烧掉了，从此家道中落。颂平父亲是苏州人，曾经在电话公司任职，那确实是个好差事，可是奶奶不会过日子，把家给败了，父亲只好到外国轮船上做事，解放前几年又到了工厂里。甬管怎么说，按共产党划成分的政策，只看解放前三年你是干什么的，那一段是工人就是工人，何况又抓不住什么“历史问题”，在出身上也做不出多大文章。

1966年7月27日晚，中央文革全体出动在北师大召开了一个全校大会，会上宣布撤工作组。康生讲话时说：工作组长孙友余要揪“右派学生”的后台，“右派学生”的后台是林杰，林杰的后台是关锋，关锋的后台是陈伯达，还有一个后台，就是我咧！同学们，你们看，我像不像个黑帮？像不像个黑线？像不像个黑点？康生的山东口音非常浓重，所以尽管事隔多年，康生讲话的腔调与神态竟仍然印象清晰。康生接着又说：林杰是你们的好同学，今天我把林杰带来了。于是林杰上台亮相。由于是夜间，距离太远，不仅林杰，就连中央文革其他人都看不大清楚。这次全校大会，周恩来没有出席，而且周恩来一直到去世也从未来过北师大。这恐怕与此后主掌北师大文革大权、位居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的谭厚兰对周恩来的态度有关，双方互不“感冒”，彼此心知肚明。

康生何许人也？

百度上这样介绍：康生（1898—1975），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他长期领导秘密战线工作；1966年后，与林彪、江青等相互勾结，是发动文革的主要成员之一；1975年12月16日在北京病逝。1980年，中共中央开除其党籍，撤销悼词；其骨灰被迁出八宝山革命公墓，后被划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之一。

这里只是冷冰冰的几行字，而凡经历过师大文化革命的人无不领教过康生的厉害。其实我们并没有公开反对过他，我们只是从他的一些言行中嗅出此人气味不正。特别是1966年7月27日康生那次讲话之后，谭厚兰等干的一系列坏事背后都有康的影子，因为他们公

开宣称“康老是我们的红后台”。所以无论什么人，只要是反对谭厚兰，你一定会被扣上“反康”的大帽子，而“反康”就是“反革命”。这能不叫人产生怀疑吗？

就是这个康生，早在30年代即追随王明推行先左后右的机会主义路线，王明失势后，又见风转舵，抱上了毛泽东的粗腿，为毛搞个人崇拜立下犬马功劳。1942年延安整风中，大搞所谓“抢救运动”，迫害了大批革命同志。康为此当了毛的替罪羊，一直沉寂到文化革命前。闻到毛要发动文化革命的风声，康又一马当先充当急先锋。因为一贯整人，整起人又分外卖力，可以信口雌黄，罗织罪名，以至于遭到党内外一致痛恨。此人恶到什么程度？一句话就可以定人生死，大会上他只要随意说一句：“我一看你就不是个好人！”这个人马上就大祸临头。

简单列举几个案件就能说明康生这个人坏到了什么地步：

1962年，诬蔑小说《刘志丹》，说“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由此把习仲勋等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老革命打成“反党集团”，惨遭迫害长达14年。

1966年7月27日在北师大万人大会上讲话，诬蔑贺龙“大黑帮”要搞“二月兵变”，贺龙最后被迫害致死。

1968年文革中制造“61个叛徒集团”大冤案，把大批老共产党员打成“叛徒”，迫害致死致残。

此类案件太多了，不能一一列举。真是罪恶累累，罄竹难书！

就是这个康生，竟然在临死前还上演了十分拙劣的一出戏，他通过毛宠信的王海容、唐闻生等几位女“高翻”举报江青、张春桥是叛徒。你康生在中共管的就情报与审干工作，你是什么时候知道江、张是叛徒的？你明明早就知道，却为江与毛的结合牵线搭桥，任由他们祸国殃民，而令人骇怪的是，毛听闻后竟然没有追究任何人的责任，好像根本没有这回事！

就是这样一个佞臣，在毛泽东那里却始终是个“不倒翁”，十分得宠。此人比毛要小5岁，毛却尊称其为“康老”，于是党内外都随着这样叫。

7月27日大会后，群众组织纷纷成立，文革热潮重新席卷师大。

7月29日上边通知各学校派出红卫兵代表到人民大会堂开会，颂平也被通知去参加。就是在这次会上，刘少奇讲话中说出那两句后来广为流传的名言，一句是：这次文化大革命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一句是：问我文化大革命怎么搞？老实说，我也不晓得。出人意料的是，刘少奇讲话刚完，毛泽东突然从后台走了出来，引起与会者的狂热欢呼，之后，毛未说一句话，又退回后台。文革后有文章披露说，毛其实从大会开始时就一直坐在后台，独自一人，始终沉默。其后事态的发展即刘少奇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突然失势，让人不禁联想到，那次大会上的惊人一幕正是毛的刻意安排。

8月1日至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8月5日，毛又出人意料地亲自写了一张大字报，题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全文只有短短200余字。看到这张大字报，我们这些当时只有20来岁、对党内斗争一无所知的青年学生只感到目瞪口呆，尽管从文中气势及遣词造句的异乎寻常中感觉得到中央上层可能发生了某种重大变故，但又说不清楚，只是隐隐感到还会有更大的事情要发生。

8月9日晚，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广播，公报热情赞扬红卫兵小将的革命造反精神。

这对于曾因为反工作组而多日受压的青年学生来说无疑是个巨大鼓舞，革命热情如火山般强烈迸发。我们通宵达旦地讨论、争论、辩论，刷大标语，写大字报，……连宿舍也不回，实在太倦了就把课桌拼起来睡一会儿。我曾记录过，从8月8日夜到8月18日晨毛第一次接见红卫兵，10天10夜，我总共睡了26个小时，而且都是在课桌上睡的。可能是因为年轻，也可能是因为受压后被解放，精力特别充沛，斗志特别昂扬。

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头天后半夜就从师大出发，到达天安门广场时天还未亮，我们在距离天安门城楼相当远的历史博物馆南门外的马路上席地而坐等待接见。这时有人通知我说，人民日报要约谭厚兰写一篇文章，请我代笔。我在现场很快写完交来人带走，这篇小文几天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题目好像是《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署名是“谭厚兰等七人”。

8月23日，我们中二(2)班的一群同学聚会讨论成立红卫兵，定名为“燎原红卫兵”，取意“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该组织的《宣言》是由我执笔写的，后来，谭厚兰领头成立了“北师大红卫兵井冈山战斗团”，其宣言听说用的就是“燎原红卫兵”的宣言。说来颇具讽刺意味，因为出身问题，我作为这个组织宣言的起草者，竟然不能加入这个与“血统论”划不清界限的“井冈山战斗团”，文革自始至终我都不是“师大井冈山”的一员，因此这个组织在中央文革操纵下干的所有坏事，本人一件都没有参与，为此，我内心感到坦然、欣慰；而且我也因为始终坚持与之对立、斗争而感到自豪。

第三章 “红八月”家被抄出外“大串连”

中央文革于1966年7月27日在北师于召开万人大会以后，受压的学生虽然感觉“翻身”了，可是仍然处于少数地位，学校里原来保党委、保工作组的一派还是占优势。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十六条”的公布，毛的大字报及接见红卫兵，这些对形势的转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正当师大内部两派处于相持状态时，“大串连”的热潮掀起来了，开始时是北京的红卫去全国各地，很快，全国各地的红卫兵都跑到北京，这才有后来毛的八次接见红卫兵。

“大串连”的兴起与毛要彻底打倒刘少奇的战略部署有关，毛看到推行文革阻力很大，各地党政机关不听号令，于是煽动红卫兵到外地各省市“点火”。“点火”“放火”这类词语当时是江青等人经常挂在嘴边的，走到哪儿说到哪儿：“红卫兵小将们，我是来放火的！”这种充满暴力色彩与江湖气的话听上去怪怪的。上边打什么算盘下边当然不知道，但是“大串连”太合青少年学生的心思了。谁能想到会有这样的好事：坐车不要钱，吃饭不要钱，住店不要钱……打着造反旗号，名正言顺、堂而皇之地游山玩水，还有比这更惬意的事吗？

不知道文革“大串连”消耗掉国家多少钱，换来的就是全国大乱。时至今日还有人吹捧毛的非凡“魄力”，像这样祸国殃民的“魄力”确实只有毛才具有。

我们中二(2)班虽然成立了红卫兵，其实并不知道要干什么，刚好“大串连”兴起，大家就商量出去串连。

我们一行七、八个人是7月28日离开北京的。我已经好长时间没回过家了，临走前我得回家看看。一到家发现家里被“抄”了，东西乱七八糟扔了一地。听母亲说，不知从哪儿来的一帮人，打着红卫兵旗号，气势汹汹地乱翻一通，没有翻到什么政治上禁忌的东西，但拿走了我爷爷收藏留下的一些古董，还把几双高跟鞋的鞋跟给剁掉了。

对于“抄家”我有思想准备，一个是因为报上一直在鼓吹所谓“破四旧”，许多幼稚的中学生跑到大街上剪行人的裤脚和女人烫的头发，有些人跑到王府井把全聚德烤鸭店的招牌给砸掉，改成“北京烤鸭店”。20年后，我在《农村青年》杂志任主编时属下的美术编辑刘效义告诉我，当年他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读书，全聚德烤鸭店的牌子就是他带人去砸的。刘是个干部子弟，文革初期的红卫兵头头儿，但为人挺忠厚，因为擅长折纸艺术，被某外国出版机构列入“世界名人”。还有人把协和医院改成“反帝医院”，把“东西交民巷”改成“反帝路”，……另一个是我知道我家早晚会成为动手的目标，因为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是被“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点名的，而我父亲与陆平的关系邻居都知道，批陆大字报一出，我家门口就被贴了大字报，质问我父亲和陆平是什么关系，大字报上还配有漫画，画着两男一女从小汽车上下来，身上分别写着陆平及我父母的名字。

看到家里被糟踏得一塌糊涂，我心里很愤怒，但也无可奈何。父亲我没见到，不知命运如何。对于文革发展下去，国家会如何，个人与家庭会如何，我内心很茫然，只能被大潮裹胁着往前走，走一步看一步吧。当时我还不知道在中央文革江青等人的煽动下，北京已经打死逼死了很多人，其中包括著名作家老舍，后来知道，他是在8月24日遭到红卫兵毒打的等二天，只身跑到离北师大不远的太平湖自沉而死的。老舍一心追求光明，写了那么多歌颂新时代的作品，被誉为“人民艺术家”，可是他的结局却是那样惨。他有一部电

影作品《龙须沟》，我在很小的时候就看过，里边有个人物叫“程疯子”，因为在旧社会被警察无辜殴打，为了自我保护不得不装疯。而老舍本人在他衷心讴歌的“新社会”里，结局却比程疯子惨得多，这样的对比真是莫大的讽刺啊！

在这段时间里，北师大也不断有人自杀，主要是些老教授，据不完全统计有：

政教系胡明教授，

物理系朱启贤教授，马特教授，

邱椿教授被斗时心脏病发作，红卫兵把药打掉而死，

中文系刘盼遂教授死在水缸里，

中文系叶苍岑教授在师大宿舍被打死，

天文系一对教授夫妇触电自杀，

中文系卢治恒讲师在临汾分校自杀，

政教系石磐教授从主楼七楼跳下自杀，

.....

所谓“红八月”造成的“红色恐怖”下到底死了多少人，至今没有见到官方统计——他们不愿意做这件事，而且也不希望别人做。有一个人做了这件事，她叫王友琴，原北师大女附中学生。我听说这个名字还是刚恢复高考时，有一位文科女状元就叫这个名字，后来听说她考进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三十年后我在加拿大多伦多的一所图书馆里看到了一本书，殷红如凝血般的封面上五个白色大字：文革受难者。这是王友琴花费多年时间、独自一人默默完成的一项大工程。这是一项艰难的工程，不仅因为年代久远，真相难觅，更让人感慨的并非技术性困难。按说年代久远，有些话可以说了，不，很多人仍然心有余悸，不忍、不愿、甚至不敢说出真相。成年甚至老年的老师、校长被一群十五、六岁的中生活活打死，施暴者中还有不少正值花季的女孩子！书中记载了几百个案例，充满了惨不忍睹的残暴与血腥，令我多次掩卷流泪。这本书是在国外出版的，为什么国内不能出版？不是说“忘记过去就是背叛”吗？不是说“健忘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民族”吗？

改变家庭的处境我完全无能为力，只能一咬牙、一狠心，跟同学们一道登上了南下的列车，目标长沙。

因为刚刚经历了家里被抄的遭遇，我的情绪很压抑，好在能和颂平及一班要好的同学一道出去心情又有所舒缓。

我们串连的第一目的地是长沙，为什么选长沙？当然跟毛泽东老家在湖南有关，到了长沙就可以去韶山朝拜革命圣地了。当时“大串连”刚开始，跑到外地的红卫兵还不多，因此我们一到长沙就受到了热情招待，被请到一家饭店吃饭。望着满桌菜肴，有同学竟产生了猜疑：不会是省委要拉拢腐蚀北京来的红卫兵吧？于是决定：不吃他们的饭。事后想想，阶级斗争的弦绷得也未免太紧了，那么好的一桌菜不吃未免可惜。

当时的湖南省委书记是王延春，文革一开始即受到冲击，省委出面负责接待工作的是省委书记处书记华国锋，正是后来毛钦定为接班人、又抓捕了“四人帮”的那个“英明领袖”华国锋。为了印刷得到毛盛赞的清华附中红卫兵撰写的三篇文章《三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我们到省委找了华国锋，经他批准印了几千份传单，很厚的一大叠，8开白纸，红色油墨，看上去挺漂亮。

北京来了红卫兵的消息不知为什么传得很快，有人就来邀请我们，原来是宁乡县的造反派组织，第二天上午要召开全县大会批斗县委书记郭连贵。这时我们才知道，宁乡花明楼是刘少奇的老家，离毛的老家韶山冲不远。于是我们接受了邀请，连夜乘汽车赶往宁乡县城。一路走的是乡间公路，没有路灯，只见汽车前大灯打得雪亮，随着路面起伏扫过路边黑黝黝的树丛，因为过去从来没有这种经历，所以感觉上很是新奇。

车到宁乡天还未亮，在招待所休息了两个小时，因为兴奋似睡非睡。天亮赶到会场，已经是人山人海，场面宏大，看上去不会少于几万人。最让人惊奇的是，全场红旗招展，其中有不少竟是大革命时期的那种镰刀、犁头旗，过去我们只在电影上看到过。大会开始，把县委书记郭连贵押上台。这是个中年汉子，看上去蛮朴实的一个人。20年后我因公出差去湖南，问起当年宁乡县委书记，还真有人知道，说那是一个不错的干部。后来说不错，

当年可是得挨批斗，所谓罪状无非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等一堆政治大帽子。我们作为北京红卫兵也应邀发言，其实我们知道什么？不过是跟着摇旗呐喊壮声势而已。

回到长沙，我们住在长沙一中的教室里，好在是夏天，用不着铺盖。对一中我留下的唯一印象是南方的冬青树，绿油油的，密密麻麻一棵挨一棵，长成一人多高像一堵墙。这种植物北方很少看到。

在长沙逗留的几天里我们还干了一件事，就是应邀跟着当地的红卫兵组织去抄了一次家。这户人家可能原来是国民党军官，从家中翻出了带有蒋介石头像的委任状等物，但整个过程没有打人、毁物等过火行为，总的来说比较“温和”。我因为自己家被抄过，将心比心，除了翻翻书架上的一些书外，什么都没干。但无论如何这样干是错的，应该向这户人家道歉。

这次行动一开始颂平也去了，但在从大卡车上下来时，脚刚一落地人就晕过去了，倒地时右边脸上颧骨处还被擦破一块。很可能是因为贫血，这种突然晕倒的事以后还发生过几次。后来颂平告诉我她小时候身体很不好，经常因病不能去上课，到了少女时期又有痛经毛病，病一来连续几天疼得死去活来。也许正是这种情况造就了颂平忍受病痛的毅力，也因此养成了自学的习惯，尽管缺课很多，但学习成绩仍然很好。病痛磨炼了颂平的意志，对她一生都有极大影响，其后无论遇到多么严峻的考验，她都能以百折不挠的顽强意志挺过去。后来颂平说，当时晕倒是老天爷不让她干坏事。

据颂平讲，除病痛外，对她一生影响最大的是她的父亲。父亲很喜欢她，她跟父亲的关系从精神上超过母亲。父亲从她很小的时候就给她讲老子、庄子的故事，使她从小就懂得人皆有死，死并不可怕，而是辩证法的胜利。因此可以说老庄思想从小就在她头脑里扎下了根基。父亲喜欢女儿到什么程度？用上海人的话说，喝酒不用下酒菜，只须把女儿放在膝头上，看一眼女儿喝一口酒。中国古代传统哲学令她从小养成独立思考、不人云亦云的性格，如果认为自己的主张是正确的就会义无反顾地去坚持。正是这种品质使她能够在纷繁复杂的文化革命中没有迷失方向，而且能为坚持真理虽历经磨难而始终不屈。

离开长沙，我们去了韶山，在那里参观了毛的故居，说老实话，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至少我本人始终没有那么狂热，到了这里也不觉得自己是来“朝圣”的。

9月中旬我们离开长沙去了上海，不仅因为这里是中国最大的城市，而且是颂平的老家，一块去到她家里看看吧。此时串联的队伍已经分散成好几拨，我们一行只剩了三个人：颂平、李先华和我。我和李先华住在华东师范大学的学生教室里，地上铺的只有稻草。当时已有北京的红卫兵到了上海“点火”，其中还有我们北师大中文系三年级一个叫李以洪的女学生，好像是个干部子弟，街上有不少他们贴的“炮轰上海市委”的大标语，然而没有多少人响应，上海基本上还是被由老工人组成的保上海市委的工人组织“赤卫队”控制。我们并没有参加北京红卫兵的活动，而是到各高校去看大字报。记得在上海音乐学院看到揭批其院长贺绿汀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对贺，我们从孩童时代就知道，他写的《游击队歌》太有名了：“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贺不光是音乐家，他还是个老革命，很早就参加了新四军，没想到连这样的人也被打倒在地，惨遭迫害。

对上海那一段生活印象最深刻的记忆不是别的，而是一首歌曲，每天华师大都通过大喇叭反反复复地播送，其旋律与歌词至今难忘：“最响亮的歌是东方红，最伟大的领袖是毛泽东，毛泽东，毛泽东，你指引我们前进的方向，你是我们胜利的保证……”

这个现象让我产生了一些感想，那就是音乐作品的特殊作用，不管时间过去多久，往事早已变得漫漶不清，然而只要有一支你曾经熟悉的旋律响起，对往事的记忆仿佛在一瞬间突然被唤醒，你会记起许多你以为早就忘却的事情，一个个场景变得鲜活起来，一切就像昨日般清晰而且亲切……

颂平住在自己家里，她家离华师大不远。有一次她到华师大找我们，还带来一些她母亲做的桂花糖藕，在藕的孔洞中塞满糯米，蒸熟之后变成粉色，切成一指厚的片片，浇上桂花糖汁，甜甜的很好吃，这是我第一次吃到这种独有特色的南方甜食。

颂平带我和李先华到她家里见到了她的父母。颂平的母亲是个典型的贤妻良母，很勤劳也很能干，特别是烧得一手好菜，不光她自己的三个孩子，就连她的几个弟妹都是她一手带大的。颂平的父亲因患脑溢血已经半身不遂生活不能自理，一切需要人侍候。据说这都是因为女儿考到北京思女心切造成的。颂平父亲身材高大而且很胖，体重得超过200斤，帮助他起身，甚至翻个身都很困难，这对于身高只有一米五十几的颂平妈妈来说就尤其困难。三个孩子都不在家，颂平和哥哥都在北京，哥哥在人民大学中文系读书，弟弟参军在东北空军服役，家中所有事情都要母亲一人打理，最叫人佩服的是她母亲除了人民陪审员外，竟然还当着街道食堂的主任，在这个食堂吃饭的有上千人，因为食堂办得好，饭好吃且便宜，以至把周围的一些饭店都挤得够呛。颂平带我们去吃过一两次饭，确实不错。

颂平家住沪西曹家渡，一条弄堂里石库门房子的二楼二十多平米窗子朝南的一大间，在后半部隔出来大约四分之一一小间，就是颂平睡觉的地方，放了两张很窄的单人床，有时颂平外婆来也睡在这里。颂平让我和李先华从华师大搬到她阿姨、即她母亲的妹妹家住。阿姨家住在离闸北火车站不远的宝山路，我记得宝山路这个地名与蒋介石发动的“4.12政变”还有点关系。为什么住到那里去呢？一是因为那里有间空房，二是当时担任街道办事处主任的姨夫正受到冲击。姨夫姓连，是山东南下干部，与阿姨育有三个女儿，最大的10岁，最小的才4岁。阿姨是老工人，当时参加的是赤卫队，如果“北京来的红卫兵”住在她家里，既可以壮胆，又可以吓阻那些本地造反派的袭扰。

住到阿姨家后，吃住条件都好多了，每天阿姨把饭菜做好，我们用煤油炉子热热就可以吃。我一顿一般吃两碗就够了，李先华却至少要吃4碗。每当李还要添饭时，阿姨最小的那个女儿小芬就会用上海话吃惊地叫喊：“依怀(还)要七(吃)啊！”后来这成了我们开玩笑的一个传统段子。上海老百姓过日子很节俭，有时天快黑了我们去拉灯绳，年方才4岁的小芬就会嘟嘟地说：“开灯早咧。”上海底层老百姓过日子抠门儿或说节俭到了什么程度，举一个小例子就可以知道：一块蜂窝煤下面垫一张旧报纸，用小锯条小心地拦腰锯开，一次使半块，锯下的煤末也要收起来不能扔留着用。这是我亲眼见到的，不瞎说。

李先华是安徽芜湖人，生于1945年，比我大一岁。1959至1962年正是他十几岁长身体的时候，一个农村孩子吃不饱饭当然会影响到他的生长发育。我本身就是矮小体弱，高中毕业时才勉强长到1.68米高，体重只有120多斤，可是李就更惨，刚进校时大概也就1.60米出头，男同学在一起爱打闹，我可以一只手卷住李的腰把他塞入上下铺的空档里，你可以想见李是多么瘦弱。不仅如此，李刚入校时面色也很差，体检时查出有钩虫病，住了一段校医院治好了病，吃得多，长得快，不到一年就窜到了1.76米，脸上有了血色，但还不是很健壮，走起路来晃晃荡荡。李是贫农出身，不是团员，也不太积极要求进步。他也是个酷爱读书的人，每天爱泡图书馆，别人身背一个书包，他则背两个书包，左肩一个，右肩一个。

颂平和李一个团小组，还是组长，课下活动一般都按团小组在男生宿舍里，所以他们接触就比较多。1966年6月23日颂平和李一块贴出反工作组的大字报，两人又一块受压，可能是这些经历使李明显地追求颂平，不知道当时颂平是否了解李的心思，但后来“大串连”时每次当李表露出要赶我走的意图时，颂平都要把我拉住，但又做得很自然，不让你产生什么非份之想。

我就是从李口中第一次隐隐约约地得知大跃进后的中国农村发生过饿死人的事情。一般说来，被“杀、关、管”的几乎都是“地富反坏右”五类份子，没想到对贫农出身参军竟也有限制，这在我真是闻所未闻的新鲜。想清楚了也不奇怪，当兵是要拿枪杆子的，如果家中有人曾被饿死，其亲属或后代中有人拿了枪杆子当然是件危险的事——谁知道他会把枪杆子对准谁？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者不可能对枪杆子掌握在谁手中这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掉以轻心。

1966年的国庆节快到了，上边发出一个停止“大串连”的通知，要求红卫兵在国庆前都回到北京，我和颂平、李三人就是在10月1日那天早上赶回北京的。本以为运动会趋于结束，没想到毛第二次接见红卫兵，人民日报社论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毫无停止迹象。师大校内，“保守派”红卫兵师刚被冲垮，造反派组织“井冈山”内部就

发生了分裂，谭厚兰在林杰支持下，更多地依靠一些“头上有皱纹”的所谓“革命小将”，就是年龄比较大也比较听话的一些教师，造成很多较早反对工作组、并曾与谭厚兰并肩战斗过的“老造反”的不满。矛盾发展以后，谭竟然在林杰授意下，把当时担任井冈山战斗团团长的郑云云打成“赫鲁晓夫”，“井冈山”分裂了。

郑云云是中文系五年级学生，比我们大几岁，为人比较忠厚，与我们中二(2)班的同学关系密切，郑倒霉，我们班的同学都同情、倾向郑，从此以后与谭厚兰开始对立。然而这些人毕竟太年轻，当谭厚兰在林杰授意下开始在师大校内抓权时，他们却离开了师大，跑到外边串连，还有人写了一些口号激进的大字报并因此被林杰抓住口实，冠上了“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大帽子，后来竟动用了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进行批判。

从1966年8月18日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到1966年11月中旬，毛一共8次接见红卫兵，其目的是要把文革之火烧向全国，向全国各地刘少奇的代理人发起冲击，最后实现彻底打倒刘少奇的目的。当然这是毛心中的计划，没有多少人看得清。看看师大已经没什么事可干，而全国“大串连”并没有结束，我们准备再出去串连。

第一次出去串连，因为出去的早，人不多，乘车、住宿等条件都不错，后来就不行了，全国的大中学生差不多都出来了，可想而知，铁路上的压力得有多大。现在的人根本无法想象那时候拥挤到了什么程度：车门根本上不去，只能连拉带拽从窗子里爬进去。车里别说座位了，连站脚的空隙都难找。厕所里，座位下，行李架上都是人，这三个地方我都呆过。有一次从太原带一架油印机回来，我几乎是一只脚站了十几个小时，另一只脚楞是落不下去。可是对于那时候的年轻人说来，这些都算不上什么苦，一是仗着年轻，二是心怀幼稚的虔诚，当然，也不排除免费游山玩水的快乐。

在“大串连”的火车上遇到过一个人，比我大几岁，自我介绍叫焦晃。焦晃是谁？我不知道。对方赶紧解释说，我是上海话剧院的演员，就是我的老婆被上海工总司潘国平潘司令抢走了。原来如此。当时我还想，此人也未免太坦率了，跟一个素不相识的人甫一见面就说这个，可能是他这件事当时在上海尽人皆知，所以他就以为谁都不应该不知道。上

海文革初期潘国平的名气比王洪文大，而这个焦晃就是几十年后成了中国话剧界“大腕儿”的那个焦晃，号称“南焦北于”，“于”指的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著名话剧演员于是之。

第四章 1966 年底大寨之行与我的黄山之恋

1966 年 11 月上旬，我们一班人马又出去串连，这一行人中我记得有中四的杨文明，刘作舟，有刘的女朋友、生物系的一位姓张的女同学，还有历史系的杜桂龙和我，总共六、七个人，目的是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杨和刘都是山西人，算是回老家了，我们跟着去，是冲着大寨去的。那个时候的大寨可了不得，那是毛泽东亲自树的典型，当时的口号是：“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

乘火车到了太原，其余的路就得靠双脚了。时令已经入冬，起伏的丘陵地一片灰黄，自然条件确实恶劣。

走了两天到得敬仰已久的大寨，住进了大队招待所，那也是窑洞，只是比较讲究，窑面是青石块垒起的，窑洞进深大概有七、八米，靠窗是一铺炕，往里看去黑糊糊的，采光很差。后来知道，社员们住的窑洞差不多都是这样的，只是里边半间都放了几口大缸，腌着咸菜。这样的居住条件在当时的山西农村已经算是相当好的了。

冬天天黑得早，一夜过去，天色微明，只听得烟袋锅敲炕沿儿的声音，转头一看，只见一人歪着身子坐在炕边儿，仔细一看，可不得了，竟然是陈永贵，赶快爬起来。唠了些什么，记不得了，记得的是他在我们的《毛主席语录》本上题了辞，我的那本扉页上写的是：“一定要把毛泽东思想学到手。”我记得那天是 11 月 13 日，为什么记得那么清楚？因为他写字写得很慢，就这十几个字他写了好几分钟，而且把日期里那个“3”写成了三个弯儿。这个语录本可能还在，算得上文革文物了吧。

那时候爱讲“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同住没做到，同吃也没做到，我们在招待所吃羊肉面，一碗记得是一角四分，那个时候这就很贵了，其实也没见到什么肉。而社员们吃什么呢？就是玉米面加小米，熬得粘粘糊糊，社员们用那种老的粗瓷碗盛上冒尖的一大碗，从缸里抓一把咸菜放在上边，这就是他们的饭菜了，一个个往地上或板凳上一蹲，就稀里呼噜地吃起来。那咸菜什么味道？试着尝了尝，咸酸苦涩，跟我们城里的咸菜完全不一样。

既然已经到了大寨，那就要向贫下农学习，学习最重要的内容当然是劳动，所以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跟社员们下地去了。这里的自然条件确实差，号称“七沟八梁一面坡”，地块都不大，还分布在山坡上，一条条梯田种的都是老玉米。还没干活，先要走好多路。到了地里，社员们一个个坐下抽烟，这烟一抽就是大半个钟头，然后，领头的喊一嗓子：“动弹动弹吧！”大家便懒洋洋慢慢吞吞地开始干活。干了几天活儿，见过了报上宣传的两个模范人物，一个是铁姑娘队长郭风莲，那是个跟我们差不多大的女孩子，跟我们一起掰棒子。另一个是治坡造田的老模范梁便良，看上去有五十多岁，个子不高，矮墩墩的，皮肤黑红，脸上布满皱纹，手伸出来，巴掌很短，指头很粗，布满老茧，那是打石头磨出来的。我们见到他那天，他仍然在打石头。

临离开北京时有人曾表示不回去了，要扎根大寨干革命。可也就呆了一个多星期，没人再提这件事。不光是自己决心动摇，其实人家也不欢迎你：干不了多少活不说，还要抢人家的口粮。可能跟陈永贵提出过这个要求，人家没答应。

12月底又一次出去串连，这次只有三个人，颂平和我，还有李先华。后来的种种迹象表明，这其实应该是李策划的，因为目标是李的老家芜湖。他本是想和颂平两个人一起走，而颂平执意拉上了我。这时我已四个月没回过家，颂平知道我家里的情况，对我说：你不用回家要钱，我家里每月给我15元，我分你一半。这对于我来说当然备觉温暖。

我们先乘火车到南京浦口，再乘轮渡过长江，当时只有武汉建了长江大桥，南京长江大桥还没有。再乘火车去芜湖，是那种绿皮慢车，座椅还是长木条的。临近年关，火车上

没多少人。颂平躺在条椅上，我坐在对面，隔着小桌说话。我俯视着她，这时我忽然发现，她的眼睛就像一汪泉水，纯净、清彻，这个印象一下子刻在了我的脑海中。那时，我们都是20刚过的少男少女，今天我们都已垂垂老矣，可印象仍然清晰如昨。

下了火车又徒步走了几个钟头积雪的土路，高高低低深一脚浅一脚。乡村冬天的夜晚，寒冷而寂静，四周旷无人迹，给人的感觉像是行走在月球上。终于到达目的地，那是黑黝黝的一座茅草房。进到房里，中间是一个火塘，疲惫不堪的我们把已经湿透的鞋子脱下来烤。昏黄的灯光下，赫然发现床底下竟然躺着一头猪！上中学、上大学时我们也下过乡，干过农活儿，但基本上在北京郊区，哪里能想到人猪混住，想想可能是怕猪冻死。

我是跟着来的，不知道人家是怎么个计划，本以为可以睡个觉休息一夜，没想到李突然又说要走，我心里其实挺生气：哪有这么瞎折腾一点儿也不尊重别人的！但也没必要为此闹崩。

往哪儿走？黄山。这次真是徒步串连了，大概走了两天，途中经过新四军军部——云岭，那个年代，这么重要的革命遗址还看不到任何纪念物。大年除夕的下午，我们已经行走在上黄山的路上，山路两旁不是松柏，就是竹林，风景不错。暮色渐浓，天上下起雪来，是那种颗粒状的霰雪。踏着路上的积雪，迎着扑面的飞雪，突然想起林冲雪夜上梁山的情景。

除夕之夜，我们终于到达了黄山，住在黄山宾馆里，那是一座琉璃瓦建筑，很气派，但是除了我们三个，没有别的客人。

黄山，过去的唯一印象是“五岳之一”，还有好像是徐霞客留下的一句话：“泰山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到底有多么神奇，还是得身临其境才能领略得到。

一觉醒来，阳光灿烂，隔窗向北望去，竟是那有名的人字瀑，冬天枯水，已经冻在岩壁上。出得门外，嚯！蓝天白云，阳光照耀之下，眼前一片高低错落的陡峭山峰，分出深浅浓淡的不同层次，看上去恍如仙境。那山体都是花岗岩构成的，呈冷峻的青铜色。最让

人称奇的是，一株株松树竟然从看不到一点土的石头缝里钻出来，顽强地挺直身躯，怪不得有人赋诗歌咏黄山松呢，那可真是大自然生命力的绝好写照。

黄山以怪石、劲松、云海、飞瀑为最著名。在黄山逗留的几天里，我们一一领略了这些大自然神工鬼斧的杰作。我们爬上了天都峰，走过了鲫鱼背，观了云海，看了日出，……可惜的是，那时我们都是穷学生，没人拥有相机，否则可以留下多少日后可资回味的珍贵记忆。

我记得黄山有三座宾馆，前山是黄山宾馆，后山是北海宾馆，中间是玉屏楼宾馆，如此设置有道理，因为黄山一天是逛不完的，不能说走到半路没地方睡觉不是。

1月6日我们已经走到后山住北海宾馆，这一天发生的两件事让我们三个人的关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上午，李先华瞅个空子对我说：你应该学会自力更生，不要依赖别人，……这个话一路上李已经说了不止一次，我当然明白什么意思。

下午，我正在睡午觉隐约觉得有动静，睁开眼睛一看，是颂平站在床边，她看着我，我看着她，互相对视着，突然，她弯下身用手捧住了我的脸，我被惊呆了，不知怎么办才好。也就几秒钟之后，她又突然撒开手，用手捂住自己的脸，迅速地后退到门边，连连摆着手，嘴里慌乱地连连说着：“对不起，对不起……”

一个是赶，一个是……，我该怎么办？

这天夜里，颂平睡着了，我拿出她的背心，一针一线地缝补上边的破洞，缝好了，同一封写好的信悄悄放在她枕旁。回到自己房里，李已入睡，我则反反复复地想：我该怎么办？我确信这只是李一个人的意思，颂平显然是不会这样想的，但既然李已下了逐客令，相处下去势必很尴尬，而且人都是有自尊心的，我不能装糊涂。那么就只剩下了一条路：走！这样决定，不光是为了维护自己的自尊心，而且也是个检验：颂平会如何反应？

思想斗争终于有了结果。天快亮的时候，我背上自己的包，走出了宾馆。下山的路十好几里一般要走一个多小时，我连跑带颠约摸四十多分钟就走完了，到哪里去？原来没想

过，现在必须要做决定。两条路，一条通产绿茶的屯溪，有长途车；一条通产红茶的祁门，没有长途车；我选了后者。我的想法是，去屯溪，如果要追的话，有汽车可以追上；如果去祁门，没有汽车，要追就得靠两条腿。

决心一下，两腿生风，这一天我走了大概有90里，心里估摸着走这么多要追是追不上了。刚下山时经过的多是竹林，碗口粗的大毛竹遮天蔽日。再往前走，路两旁都是一人多高的茅草，路很窄，有的地方都难以下脚。傍晚走到一个大一点的村子准备歇息，突然有人找到我说有我的电话。你能想象得到我吃惊的程度吗？这可是50年前哪，城里电话都极少，更别说乡下了。可这是真的，可能从北京来到那里的红卫兵太稀少了，好找。我去接了电话，是李从前一个乡的乡政府打来的，他没多说，就几句话，让我别再走了，明天上午在这里等他。如果不等，他当晚就赶过来。我明白，这只能是颂平的意见。

第二天上午我等在原地，李赶了过来，说颂平乘车去了屯溪，让我们择路与她会合。

这次轮到我对李说点儿什么了。我把已经写好的一封信给了李，具体怎么说的记不太清了，只记得颇有点儿居高临下的意思，姿态挺高地教训了李一顿，李无言以对。

在浙江淳安与颂平会合后我们上船走新安江去杭州。一路上水天相接，碧波万顷，一个又一个绿茸茸的小岛从远处掠过，风景绝佳。几十年后这个地方被称为“千岛湖”，与加拿大与美国交界的那个千岛湖同名。

5年之后的又一个除夕，我已从怀柔关押地被单独送回师大关在工五楼里，深夜独坐，写下了一首《登黄山歌》，记述了这次黄山之行：

登黄山歌

公元一千九百六十六年岁暮登黄山，倏忽已整整五载矣。除旧之夕，尚身系囹圄；寒夜独坐，神思重游，往事蓦然涌上心怀。彼情此景，感慨万端，心潮汹涌，不能成寐。兀自沉吟至翌日凌晨，竟凑成《登黄山歌》三十二韵，歌毕尚自怅快彷徨良久。

记于公元一九七二年元旦

岁暮皖南行，霰雪登黄山。日浴温泉暖，夜宿玉屏寒。
携手上天都，相勉奋力攀。会当临绝顶，恍然欲成仙。
穹窿罩四野，翘首可破天。云乱漫深谷，松奇挂危岩。
雄峰七十二，座座具殊妍。天工岂可夺，壮哉岳之冠。
余知黄山秀，不识桃花源。天命不可违，事出终有缘。
君意竟初剖，惶称偶知检。余心虽忐忑，实则久已眷。
独自尚沉湎，岂料生波澜。小人常耿耿，胸狭多毁谗。
诡言当自力，必欲逐后安。去志毅然定，补衣夜将阑。
为使君安睡，未曾一睹颜。临行不辞别，踏雪独下山。
日驱将百里，心潮卷巨川。路遥知马力，何须较此间。
君闻吾独行，惊愕不成言。遽起忘梳妆，急切亲追赶。
崎岖冰雪路，跌扑全不管。愤然责谗者，定然寻余还。
余幼失童欢，何尝有人怜？如鱼游在水，冉冉知冷暖。
新安水长碧，西子柳更棉。君心深如许，其情至可感。
生则分忧患，死亦同苦甘。君意永不负，毁言天为谴。
渊枯石可烂，此情何能湮？海内存知己，天涯共婵娟。

第五章 毛泽东亲批北师大军训经验压垮造反兵团

1966年11月，谭厚兰在关锋、林杰等授意下，亲率大队人马跑到山东曲阜“讨孔”，破坏了大批珍贵文物。

1967年元月，毛泽东支持上海“一月夺权”，“全国全面内战”开始。北师大谭厚兰在北京也到处去夺权，在这过程中发生了一系列不正常的事件，比如到中央统战部抢档案，造成严重泄密等。

这一切都引起了我们的密切关注。

1967年3月8日，以谭厚兰为首的北师大井冈山突然在全北京率先贴出炮轰谭震林的大字报，同时高喊什么“反击二月逆流”。此后以每天两个副总理的速度，4天一共炮轰了8个副总理级的国家领导人。这是什么来头？全北京所有的群众组织一下子都给打懵了。到底发生了什么？

原来所谓“二月逆流”是中央几位副总理谭震林、李先念、李富春和陈毅、徐向前、叶剑英等几位老帅不满江青与中央文革的倒行逆施，在怀仁堂和京西宾馆于2月里召开的两次会议上公开痛斥江青等的事件，因为扯到了当年延安整风，引起了毛泽东的震怒。林杰抢先把消息捅给了谭厚兰，让她来抢反“二月逆流”的头功。得知内情后，首都各大专院校的红卫兵组织不敢怠慢纷纷跟进，唯恐在这个关键时刻站错了队。

难道毛主席又有了新的战略部署？局势180度的突变，让人一下子辨不清方向。

在这种极其复杂的形势下，为了避免站错队犯错误，颂平在和同学们商量后，忍痛于3月24日贴出“造反兵团被迫解散”的声明。在此之前，造反兵团主要负责人李庆林已经带着兵团中大部分人声明退出兵团，“重回井冈山”。

为了弄清真相，颂平不断地到国务院各部委去做调查研究。在此过程中，她发现谭厚兰真正的目的并不是几个副总理和老帅，而是这些副总理和老帅身后的周总理，即他们所谓“新文革与旧政府的矛盾”，这使她更加感到困惑。一边是毛，一边是周，到底应该站在哪一边？说到这里别忘了，我们都是“毛主席的红卫兵”，一直以来都是信誓旦旦地以“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誓死保卫毛主席”为己任、为自豪的。首先一个问题：这到底是不是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弄错了可不是闹着玩儿的。第二、如果真是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怎么办？按说应该紧跟，可周总理在我们心目中的形象也是那么高大呵，怎么办呢？

还有一个问题：那些干了好多坏事、被我们认为是大有问题的人，恰恰是看上去跟毛主席最紧，冲在最前头的，对此到底该怎么理解？

好在这样的困惑与纠结只延续了不太长的时间，颂平和我们逐渐看清了问题的性质，并拿定了主意：总理不能反，而谭厚兰等人的做法大为可疑。

当然，时间的推移最终解开了第三个问题的谜：那些干了许多坏事的人确实是紧跟毛的，而我们始终紧紧揪住谭厚兰不放穷追到底其实是跟毛对着干的，只是当时我们还觉悟不到这一点。

关于那一段造反学生的心态，北师大外语系安希孟同学有一段文字剖析得极为透彻：

“1967年3月反二月逆流，国务院是旧政府，几位副总理成靶子。我被抽调到社科院和北师大的‘中央各部联合调查组’，那是中央文革为渗透到周恩来管辖地盘窃取动向。我被分到财贸口。然而其实没有见到过一张关于他们的大字报。没有任何文字批评过他们。只是有闻必录，但也乏‘恶’可陈。就我当时的思想而言，我也是血气方刚，觉得周总理和李先念比较右，多么希望真的能发现有关他们的大字报。我们当时的心态是巴不得捉到虱子，越多越好，可惜没有捉到虱子。”

1967年5月16日，人民日报头版下半版发表社论：《军政训练好》，上半版并转二版则用通栏大字号标题发表长篇通讯《在北大搞军训的部队是如何支持左派的》。好大的阵仗啊！用来对付谁的呢？北大造反兵团。

此篇报道通篇由谎言构成，文风则是标准的党八股。

在北大搞军训是个彻头彻尾的大阴谋，其根本目的就是要把造反兵团掐死在摇篮里，因为在王关戚林心目中，造反兵团不屈服于威胁利诱坚持揭露他们的真面目，因此是他们最危险的敌人。只要看一看毛派出军宣队、工宣队进高校的时间与对象就明白了。军训团进北大是1967年2月，而毛派军、工宣队进清华等高校是迟至1968年7月27日以后的事，在这之前，除了北大，北京其他哪一所主要高校派过所谓军训团？这一点，现在应该看得非常清楚了。

谎言之一：报道说，“‘井冈山’搞全校革命大联合，部队同志就集中力量抓这项工作。”“井冈山”什么时候搞过“全校革命大联合”？军训团进北师大，根本就不承认北师大有大联合问题，根本不承认造反兵团是革命群众组织，怎么可能搞什么大联合？事实上是把兵团压垮而告终。

谎言之二：报道说，军训团坚决支持左派。在北师大哪个组织是左派？如果师大井冈山公社是左派组织，那造反兵团就更是。因为造反兵团是个只有一百人左右的小组织，其成员大都是最早起来反工作组而被打成反革命的青年学生，反倒是谭厚兰那边之所以能有几千人之多，大部分是1967年10月批判资反路线后从红卫兵师倒戈过来的学生。该报道却颠倒黑白，把造反兵团打成“保守组织”。

谎言之三：报道说，兵团骨干成员“身上有严重的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这种说法毫无根据，纯属诬蔑。

谎言之四：报道说，兵团负责人李庆林“认识到自己已离开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自动解散了组织”，这个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事实是李庆林等在林杰的压力与利诱下公开声明“重上井冈山”，而造反兵团是在这之后的1967年3月24日公开贴出“被迫解散”声明，而其背景与军训毫无关系，主要与当时谭厚兰从其黑后台那里得到独家消息，在全北京率先“反二月逆流”，其来势凶猛，造成形势极端复杂难以正确判断有关。

40多年以后重看这篇报道，最主要的反应是：恶心！对，不是愤慨，而是恶心。脸皮太厚，用心太恶，厚黑到家了。无论多么肮脏的事，都可以说得无比冠冕堂皇。不过这都是时代的产物，从毛林开始，包括“四人帮”以及他们的小爪牙，他们哪个不是整天都在厚着脸皮说瞎话，挖空心思坑害人？林彪说：“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想起林杰当年教谭厚兰的那三句名言：一、政治斗争无诚实可言；二、政治斗争要结成死党；三、被人抓住把柄要矢口否认。呜呼！

我们为什么会一直坚持反对王力、关锋、戚本禹、林杰？我们从什么时候发现了他们的马脚？林杰上述三句后来为师大尽人皆知的名言确实给了我们极其强烈的冲击。别忘了

我们是受什么教育成长起来的，至少我们公开听到的说教都是正面的、阳光的，可是从这些话当中你闻到的是什么气味？

这是他们的“言”，他们还有“行”。谭厚兰在这些人的授意与支持下到山东曲阜以“讨孔”之名破坏了大批“国宝”级文物，借“所谓‘一月夺权’”之机抢劫了大批国家机密档案，以所谓“红色政权”之名残酷镇压反对他们的革命群众，等等……这些已经是罪恶累累了，而最终让我们看清林杰的真实面目，下定决心与他们血战到底，是由于谭厚兰奉命反击所谓“二月逆流”前后的行径，当林杰发现他们借反“二月逆流”之名行反周总理之实的行径暴露了，于是对颂平和我们恶毒地倒打一耙之后。

而戚本禹呢，是在王力、关锋、林杰已然倒台后，于1968年1月4日自己倒台的前几天，即1967年12月27日，还曾和谢富治一起上阵对造反兵团施压。

最近看到了戚本禹写的回忆录，洋洋数十万字，通篇充斥着自我吹嘘和对江青等人的吹捧，顽固地坚持文革立场。被人当了“替罪羊”，却没有一丝悔念，的确是愚蠢与顽固到了家。

戚文中有这么一段话：“在文革中，认定一个地区或者一个单位，哪些群众组织是造反派组织是件很严肃的事情。要经过中央文革小组会议的研究讨论之后，然后由总理、江青，陈伯达、康生他们几个拍板，才能确定下来。”如果真如戚说的这么严肃，那么使尽各种手段必欲将造反兵团压垮，其背后因由岂不是太耐人寻味了吗？

军训经验发表的这一天是《516通知》下达一周年的日子，在文革发动者心目中那么重要的《通知》并没有在5月16日这一天公开发表，而是推到了第二天的5月17日，5月16日这非同寻常的一天竟被让出来以中央头号媒体出面来炮打兵团。这是多么异乎寻常的举动！谁能说这背后没有处心积虑的策划！

已经有资料披露，这篇报道与社论都是毛泽东亲自修改与批准的。

就在这前后，应该是在5月中旬，颂平和兵团“被迫解散”后留下的几位同学一道贴出《春风吹又生》的大字报，正式宣告“斗陶兵团”成立，继续与谭厚兰及其黑后台进行

斗争。取名“斗陶兵团”是隐含着谭厚兰背后的王力、关锋、林杰等是反革命两面派之意，他们打着革命的旗号，干的是反革命的勾当，而我们就是要跟他们斗。

“斗陶兵团”刚成立就成了谭厚兰的眼中钉，他们指使数学系的爪牙来到我们在数学楼活动的一间教室，借口清查“反革命标语”，企图把我们赶走。我们据理力争，痛斥这帮小丑，当时他们还不敢公开动武，只得悻悻然溜走了。

以下是附录一二：人民日报关于北师大军训经验的报道及有关社论，文中凡引用毛泽东语录都使用黑体字，这是文革中惯用的，此处保持原貌。

【附录一】

在北师大搞军训的部队是如何支持左派的

人民解放军北京部队 4672 部队积极响应毛席关于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伟大号召，在北京师范大学搞军训期间，坚决和无产阶级革命派站在一起，对保守势力和中间派做了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瓦解了保守组织，提高了中间派的阶级觉悟，壮大了和巩固了左派队伍。广大革命师生一致赞扬解放军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真正支持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革命师生和解放军亲如手足。在解放军的帮助下，现在北师大已经实现了全校大联合，“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已经正式成立。

一、 在调查中解决立场问题，明确支持左派

上级交给 4672 部队军训任务时，明确提出要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坚定地支持左派广大群众，和革命左派一起批臭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他们提出并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打政治仗，不要搞调和折衷。但部队去北师大的一百五十名同

志，绝大部分未参加过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斗争，对两条路线斗争和革命左派缺乏认识，如何支持左派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家都感到棘手。

毛主席说：“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么？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部队的同志根据毛主席这一教导，进校以后，就邀请井冈山公社负责人谭厚兰系统地介绍八个月来，北师大文化大革命的情况，特别是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派工作组，维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包庇坏人，镇压革命，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假左派”等等情况。并发动曾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的革命闯将控诉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恶。

通过调查，再加上学习了毛主席的有关著作，战士们懂得了什么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认识了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革命左派。于是全体指战员下定决心，和革命左派——井冈山公社全体战士站在一起。副政委李同贺在和全体师生见面的大会上，明确表态坚决支持“井冈山”。连、排、班开会，指战员们和师生们谈话，也都表示坚决支持“井冈山”。

二、 作细致深入的政治思想工作，争取团结群众大多数

“井冈山”是一支在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搏斗中厮杀出来的队伍，部队进校时，他们已经掌了权。但是，“井冈山”的对立面——井冈山造反兵团、烽火战斗队、红旗战斗队和东方红兵团集合在一起，企图搞垮“井冈山”，整天酝酿从“井冈山”手中二次夺权。

当解放军亮明坚决支持“井冈山”的旗帜以后，“造反兵团”等组织提出强烈抗议，质问解放军：“你们为什么只依靠‘井冈山’？为什么认为我们不是革命组织？”他们拒绝参加军训，并扬言坚决要搞第二次夺权。这些组织是什么性质呢？部队的同志在深入的调查研究中发现，与“井冈山”矛盾最尖锐的“造反兵团”的骨干力量原是从“井冈山”分化出去的，有的还是“井冈山”的负责人，过去遭受过工作组的迫害。但在他们身上有严重的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其余的群众大部分是中间派，还有一部分是在批判反动路

线时退出保守组织受蒙蔽的群众。他们和“井冈山”的矛盾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大部分是思想认识问题。

部队的同志根据毛主席说的：“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这一指示，对“造反兵团”等组织展开了细致深入的政治思想工作，召开座谈会、批评会、分析会等各种会议，肯定他们过去的革命造反精神，指出他们同“井冈山”对抗和要二次夺权是错误的。副政委李同贺和参谋长刘通启不厌其烦地分别找各组织负责人谈话，帮他们分析错误和认识错误的性质，明确告诉他们发展下去的危险性，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使他们对自己的错误都有所认识，并决心改正。原来非要搞垮“井冈山”的井冈山造反兵团负责人李庆林自动带领全团展开内部整风，分析错误。在整风总结中，他们认识到自己已离开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自动解散了组织。其他组织也相继解散。李庆林等同志十分感激解放军，说解放军对他们的帮助很及时，挽救了他们。

部队同志在帮助李庆林等的同时，对“井冈山”负责人谭厚兰等也进行了说服教育工作，严格要求他们，动员他们学习了毛主席的《学习与时局》和接班人的五个条件，特别是毛主席说的“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这一条，帮助他们联系实际进行分析。谭厚兰等很赞同部队同志的意见，努力按照毛主席提的标准要求自己，主动去找李庆林等“造反兵团”的同学座谈、谈心，一方面严肃地指出他们的错误，同时也认真做自我批评。谭厚兰本人并贴大字报对“造反兵团”的革命行动表示欢迎。井冈山公社总部还发表声明，只要是改正了错误的同志，既往不咎，可以参加“井冈山”。退出“造反兵团”的同志和原来追随他们的人都纷纷申请加入“井冈山”，中间群众的认识也因此得到提高。“井冈山”很快由一千八百多人发展到三千八百人。现在，“井冈山”成员已占全校人数的百分之七十以上。李庆林等已被吸收到“井冈山”工作。

三、 狠抓毛主席著作学习，从根本上提高左派队伍

部队同志进校后，急左派所急，想左派所想，帮左派所需。他们在军训中，紧紧配合“井冈山”的战斗任务。例如“井冈山”搞整风，军训就以整风为中心，千方百计把整风搞好；“井冈山”战士走上社会，反击一个时期出现的一股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部队同志就坚决作他们的后盾；“井冈山”搞全校大联合，部队同志就集中力量抓这项工作。

部队同志在整个军训工作中，特别注意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狠抓毛主席著作学习，从根本上提高左派队伍。

井冈山公社掌权以后，学习毛主席著作抓得不紧，不少同志热衷于轰轰烈烈，整天想往外跑，坐不下来学习毛主席著作。有些虽然学习了也没有把学用结合起来。因此，只有使井冈山公社的全体战士都认识到学习毛主席著作是根本，这支队伍的水平才能真正提高。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部队的同志主动和“井冈山”总勤务站的负责人研究，根据革命师生的需要和特点，采取了三种做法：

一、部队各级干部和“井冈山”各级干部互相对口结合学习。学习时由“井冈山”的干部谈领导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解放军同志就和他们一起，根据毛主席著作进行分析，商量解决办法。效果很好。

二、开展大学、大背、大用、大唱、大宣传的“五大”活动，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当作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这样，那些每天忙着往外跑不愿学习的人也慢慢安下心来。

三、部队同志从本单位调来十位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在全校大、小学习会上介绍他们活学活用的生动事迹，为广大师生提供了活学活用的经验。

通过解放军的帮助，和广大革命师生的努力，现在，广大师生已养成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习惯，大部分师生坚持了“天天读”。一些领导干部大都学会了学用结合，初步做到了遇到问题学习毛主席著作。❷

解放军报记者 人民日报记者

原载 1967.516 《人民日报》

【附录二】

军政训练好(《人民日报》社论)

今天,本报发表了人民解放军北京部队4672部队,在北京师范大学进行军政训练,支持左派的经验。这个经验好,值得推广。

大中学校军政训练,是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进行的。

毛主席指示我们:派军队干部训练革命师生的方法很好。训练一下和不训练大不一样。这样做,可以向解放军学政治,学军事,学四个第一,学三八作风,学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加强组织纪律性。

毛主席还指示:军队应分期分批对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实行军训。并且参予关于开学、整顿组织、建立三结合领导机关和实行斗、批、改的工作。先作试点,取得经验,逐步推广。

毛主席的这些英明指示,给全国大中学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增加了新的重要内容,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伟大创举,具有伟大的战略意义。

大中学校广大革命师生热烈拥护毛主席的指示。人民解放军的广大干部战士最坚决地执行了毛主席的指示。

在军政训练过程中,解放军的广大干部战士,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持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广大革命师生密切合作,全心全意地搞好大中学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的成绩是主要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他们在工作中有了缺点错误,能够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认真进行自我批评,及时加以纠正。他们受到了广大革命师生的热情欢迎和坚决支持。

在北京师范大学执行军政训练任务的解放军同志,在这方面树立了良好的榜样,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进行军政训练，一定要支持左派，依靠左派。革命左派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先锋，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最坚决的捍卫者，他们体现了革命的大方向。每一个参加军政训练的干部战士，自己必须具有左派的立场，左派的思想，左派的感情。同时还要进行调查研究和阶级分析，善于识别左派和发现左派。只有这样，才能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做到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才能做到支持左派，依靠左派，团结大多数，使军政训练沿着毛主席指引的航道前进。

以两条路线斗争为纲，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促进思想革命化，是军政训练的根本任务。军政训练，应该是政治训练带头，用政治来挂帅。政治挂帅，就是毛泽东思想挂帅。广大革命师生只有掌握了毛泽东思想这个威力无穷的武器，才能够胜利地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大批判，大斗争，才能胜利地进行本单位的斗、批、改。这就一定要很好地组织广大师生，带着两条路线斗争中的问题，坐下来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有关著作，真正钻进去了，见诸行动了，那就说明军政训练确有成效了。如果活用活用毛主席著作这一条抓得不紧，抓得不好，不能把各种错误思想，把无政府主义、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风头主义、个人主义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从头脑中排除掉，那么，军政训练就会流于形式，就不能从根本上达到提高左派队伍，提高广大群众的目的。

大抓狠抓活的思想，坚持耐心的说服教育，是实现团结大多数的重要环节。解放军要结合学校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情况，解决犯错误干部和受蒙蔽群众中的各种思想问题。要反复劝说革命左派，遵循毛主席的教导，懂得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彻底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道理，并且按照这个道理办事。要正确地对待犯有错误的左派组织，正确地对待参加保守组织的群众。对他们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不要排斥和歧视。要帮助革命左派学会做群众工作的过硬本领，善于掌握群众的思想脉搏，抓住各种思想苗头，运用谈心方式，开展思想互助；善于把毛主席的思想，党的政策，变为广大群众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政策，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

参加军政训练的部队同志，必须把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作为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

阶级革命路线的根本要求。在学校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一定要坚持“旗帜鲜明，坚持斗争，具备条件，讲究方法”的原则。既要有只争朝夕的积极精神，又不要操之过急，急于求成。

广大的革命师生应当热烈响应毛主席的**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虚心**向解放军学习**，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密切合作，团结一致，把大中学校军政训练搞好，把大中学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原载 1967.516 《人民日报》

第六章 1967年武汉“7.20事件”与8.1横渡长江

1967年7月20日武汉“7.20事件”发生，武汉军区支持的保守派群众组织“百万雄师”绑架与殴打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而当时毛泽东就住在武汉东湖，离事件发生地距离不远，大概也因此受到了惊吓，在周恩来力劝下乘飞机离开武汉去了上海。

王力等回到北京后，7月25日，中央文革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了百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欢迎谢富治、王力回到北京，支持武汉地区造反派。林彪亲自讲话，声讨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一时间，全国人民都知道了这个“陈大麻子”。

这以后，由王力、关锋等人煽动的“极左思潮”引发的极端事件频频出现。

8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由关锋主持起草的纪念建军40周年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社论写道：“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要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同样，也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这是斗争的大方向。”由此提出了“打倒带枪的刘邓路线”的口号，一下子全国又掀起来一波“揪军内一小撮”的热潮，造反派到处抢枪，军队频频告急。

8月7日，王力约见外交部造反派，提出：红卫兵就不能干外交？部党委班子没有动吧？这么大的革命，班子不动还行？为什么不能动一动班子？揪陈毅大方向当然对，为什么不可以揪？我看你们现在权没有掌握，有点权才有威风。文革小组对革命派总是支持的。你们有什么过火？我没有看到有什么过火的地方。这就是著名的被毛泽东批为“大大大毒草”的“王八七”讲话。在王力这个讲话的鼓动下，外交部造反派于八月中旬冲砸外交部，宣布夺取部党委的大权。

同日晚上，外事口造反派和北京一些红卫兵组织冲击并焚烧了英国驻中国代办处，制造了一起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违法涉外事件。

也是在这一天，公安部长谢富治在公安部全体人员大会上提出：把原来那一套政治、思想、理论、组织方面的坏东西彻底砸烂，把旧机器彻底打碎。此后，全国各地出现冲击公检法机关、抢夺档案的事件。

这接二连三发生的事件引起了上层震怒，没过多少天，这个红得发紫的王力与关锋、林杰等就都成了阶下囚。这些人其实都是替罪羊。

武汉“7.20事件”发生后，我和兵团几个同学一起赶到武汉，参加了8月1日万人横渡长江的活动。说起来真可谓初生牛犊不怕虎，可差一点儿就让老虎给吃了。怎么回事呢？其实我水性并不好，当时最多也就能游二百米，可横渡长江至少要游几千米，胆子怎么就那么大呢？那年我刚20岁，年纪轻，胆气壮。

我在上小学的时候学过游泳，还是在北京有名的什刹海体校游泳馆。教练往水里扔一枚硬币，就让大家潜水去摸。什么都没学呢，哪敢潜到水里去呢！眼看着有基础的孩子都钻到水里去了，我只能站在水里干看着。这样去了两次就打了退堂鼓。上了大学，先学会了滑冰。冬天到了，学校在一片操场上泼水，造了个人工冰场，还有冰鞋出借，这样没几次就学会了滑冰，其实没什么难的，就是个掌握平衡的技巧，一开始当然难免要摔上几个跟头。

游泳是怎么学的呢？全靠自己摸索、自己琢磨。大学条件就是好，学校里也有游泳池，用不了几次就把“换气”这个关键技术掌握了。游泳池毕竟太小，眼光又放到了外面。北师大所在地叫北太平庄，学校往南二里多地有个小湖叫太平湖，放学后和几个同学相约去游太平湖。从湖的此岸到彼岸估摸着得有100米，一个来回就是200米。同学一下水就往对岸游，我也没多想，下了水就跟着往对岸游。游到对岸再往回游，不自量力还想追上人家，于是离此岸只有不到10米时实在是没力气了，胳膊划不动水，身体往下沉。就在这要命的时刻有人从水下托住了我，把我拖到了岸上。救我的人听说是北京市戏曲学校的，感谢他们的救命之恩。

这个太平湖就是老舍先生自沉之处。这个湖后来被填上了，据说是为了修地铁。

人跟人不一样，一般人经历过这样的险情往往就退缩了，有一个和我们同去的湖南同学后来就不再去了，所以他可能这辈子都没学会游泳；而我则不然，继续坚持。

这就是我为什么不自量力毫不犹豫就参加了长江横渡的原因，当然，也丝毫没想到，真实的场面竟是那样惊险，差一点儿有去无还。

横渡的头天晚上，我们一起去了东湖游泳，水一点儿不凉，倒像是在洗温水澡。夜色很黑，照明很差，面对面几乎都看不见人。这时候我们并不知道，就在前下久毛泽东也住在东湖，其住地应该离这里不太远。文革后有文章披露，当时“百万雄师”扣压了谢富治、王力，是周恩来劝说毛离开了武汉。

8月1日渡江那天一大早，我和物理系刁士元、数学系丁青元等几个同学即赶到江边，现场人山人海，锣鼓喧天，彩旗飘扬。我们是从武昌出发，长江大桥就在左手边，终点是汉口。横渡开始，人群向江边移动，不知怎么回事，前边速度慢了下来，可后边的人仍然往前推挤，力量越来越大，我们几个只好挽住臂膀，双脚拼命抵住地面，可还是被推着向前移动。下边就是台阶，一级一级艰难地往下移动，眼看着快到江边了，只见人墙一排一排地轰然倒向江中，原来是台阶突然没有了。落入水中之后，我拼命想浮起来往外游，可是，人挤人，人推人，人压人……一片混乱。我感到，一会儿是别人把我按到水里，一会

儿是我把别人按到水里，总之，人人都想挣扎着浮起来。不好！有一个人竟然骑在了我的脖子上，怎么也摆脱不了，我开始一口一口地喝水。这时，头脑竟然还很清醒，一个可怕的念头闪过：这次我可能回不去了！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其实最多大概也就两三分钟，因为时间再长人就不行了，脖子上的人终于被甩脱了。我赶紧浮上水面，一边向前游动，一边回头望，这时离江边已经有一段距离，人也分散开，但我觉得实在是游不动了。幸运的是，有一艘救人的小船划过来了，我用尽气力扒住船帮爬上了船，只剩下大口大口喘气的份了。可是。没等你喘几分钟，人家就赶你下船，说是还要去救人。望望船外湍急的江流，再望望迷蒙一片看不清的对岸，牙一咬，心一横，纵身又跳进了水中。嘿，再一下水，那感觉竟然不一样了，没有那么费力，刚才精疲力竭完全是与人搏斗的结果。江流很急，人虽然是瞄着对岸游，可被水流迅速地往下冲，所以实际上走了一条大斜线，左手边的长江大桥越来越模糊，渐渐地看不清了。游过大概一半时，左边江面突然开阔起来，我想那应该是汉水与长江的汇流之处。继续向着对岸奋勇前进，我发现，人的身体随着波浪起伏游动显得很轻松，当波浪把我涌上浪尖时，我竟然想笑出来。游了不知多长时间，对岸建筑物的轮廓渐渐清晰起来，水也越来越浅，双脚终于落到了实地。走上岸来，发现裤衩上都是黄色的泥沙，其实下水时已经发现长江的水不是绿的，而是混浊的暗灰黄色，什么时候长江也变得跟黄河差不多了？因为与同学早就打散，只剩我一个人跟着大队走在汉口的大街上，算是游行。不下于40度的气温，柏油路面软软的都快被晒化了，赤脚走在上面烫得要命，城里长大的孩子什么时候打过赤脚啊，只好蹦蹦跳跳地来回换脚，看上去很滑稽。

回到住地才知道，下水时刁士元一看那混乱情况，马上游上岸到指挥部广播找人。其实，怎么找人呢？这是根本办不到的。

刁就是武汉长大的，水性好，知道我水性不好，担心我出事。

这次横渡真就出了事，出了大事。据说死了几百人，武汉有个水上女子民兵排，在最前边推标语牌，死了一半。清华井冈山也死了一个，第二天还到殡仪馆去找人。当时流言

很多，如说“百万雄师”派人藏在水下拖人的，我看都是瞎说，“7.20事件”刚过，组织混乱是肯定的。

但是武汉的天气实在是太热了，热到什么程度？中午吃饭时，汗水顺着两颊和下巴不住地往下滴，在那儿呆了不到一周，长了满身满脸的痱子。武汉早有“火炉”之称，看来真是名不虚传。

大难不死，此地不可久留，速速回京去也。

附录三是武汉一位当年只有14岁的女孩子的追忆文字，她真实地记录了这次事件发生时的惨景。

【附录三】

文革武汉惨案：造反派组织横渡长江数百人丧生

一直不知道应该怎样向我的孩子述说40年前不堪回首的一天，那是我终生的噩梦，挥之不去却又难于述说。数百条活泼泼的年轻生命就在我的眼前一瞬间化为亡灵，而我从成堆的尸体中逃出生天。那是1967年的武汉，那一天是8月1日，我还不满14岁。

1967是中国的凶年，更是武汉的凶年。

前一年的7月16日，是中国人民向世界宣告伟大领袖身体依然健康的重要日子。这天毛泽东从湖南来到武汉，事先就通知武汉方面他要戏水长江。他力斥一干高官对他73岁高龄的担心，无论天气如何、水流如何、安全工作做得如何他都一定要游。那一天他如愿游了长江，回到北京便发表了著名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于是全中国都燃烧了起来，于是这一天也就成了武汉特殊的纪念日。

一年后的7月，文革和天气一起进入白热化，武斗、流血、死人已是家常便饭。惊天的所谓“7.20兵变事件”，更是把这座火炉之城变成了炼狱，江城三镇的上空弥漫着疯狂

和仇恨，人人亢奋莫名。7月16日，“紧跟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的纪念渡江活动，由于两派血腥的武斗给耽误了，于是“7.20事件”之后的8月1日，在造反派绝对掌握了权力之后，这样伟大的纪念活动是一定要补上的。

谁能料到就是这个“赤日炎炎似火烧”的日子——1967年8月1日，竟成了武汉人的劫数。此时的武汉，基本上已经是无政府状态，尽管新掌权的造反派是这场渡江纪念活动发起者，但参加活动的人们，都是抱着对毛泽东主席一腔热爱而来的。造反派掌权者可以发起活动，但却没有任何管理和组织活动的的能力。

从早晨开始，现场就是一片混乱的人海，沿江大道上的人头看不到边。据说仅渡江者就上万，还不包括看热闹的。将近9点，我听到远处喇叭里钢工总一号头头朱鸿霞在演讲，这个业余诗人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全然不顾赤脚站在将近40度地面上快要被蒸熟了的人们。人群逐渐开始骚动，在无法忍受的酷热下人们完全没有了秩序的概念。前面的还没有接到下水的信号，后面的人浪就不断涌过来。只听到很多人喊：“不要挤，要出人命了！”“不得了，死人了！”吼声几乎震聋了我的耳朵，却根本无济于事。我们几个初中的小女孩是跟着武汉体育学院的大哥哥大姐姐们来的，这时被人群挤在汉阳门下水处的台阶中段，上下两难。拥挤使我感到呼吸困难，我努力向上仰起头，以免窒息。健壮的体院大学生们组成人墙把我们围在中间，他们简短地商量了一下，当机立断，将我们几个初中女学生连拉带拽托上人群的头顶，我们就从涌涌的人头上爬了上来，离开了死亡的台阶。我们回到马路上又以最快的速度跑上大桥。我看到桥下我们原来站立的地方人如蝼蚁，马路上人如蝼蚁，水里也是人如蝼蚁，后面的踩踏着前面的然后又被更后面的踩踏。我知道留下的还有几个体操专业的女大学生，她们小巧玲珑，个子不比我们高出多少，只是年龄长我们几岁，在那成团成块的人群里她们是很难挣扎出来的。

事后我听说，我们几个小女孩刚刚离开阶梯，可怕的拥挤就急剧升级了。就是我在大桥上看到的，渡江的人被挤下水，看热闹的人被推下水，岸上被人踩，水里被人踩，人压人，人踩人，还有尖利的东西在水里面“杀人”。这些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被盛传的“杀

人暗器”，其实是被挤烂了的渡江宣传牌上散落的毛泽东像章，成千上万个受到顶礼膜拜的偶像，此时却成了夺命的凶器。江边的铁栅栏被挤垮了，很多并不准备渡江的人就直接从高处摔进水里。已经入水的人根本不成队伍，在8月的大江激流里立刻就被冲散了，水性好的被水性差的拖住，很快就没了顶。我浑身颤抖，顺着大桥的铁栏杆跌坐在滚烫的地面上。四周是地狱般的灼热我却浑身发冷，眼下是地狱般的喧嚣我却听不见一点声息。一列火车正从桥下通过，大桥桥身随着火车的轰鸣和我一样战栗着，我的泪水和汗水流在了一起。

这次愚昧的大混乱夺走了数百条鲜活的生命，他们很多都是大学生，华师的、体院的、水院的、武大的、华工的、华农的……他们如果活着，如今都应该是含饴弄孙的年龄了。多年以后我领着未满14岁的女儿再一次来到这里。站在当年夺命的台阶上，我下意识地仰起头来，眼前突然就出现了很多年轻英俊的面孔，我看见几个小姑娘被一双双年青、无私、有力的大手托起，让她们从拥挤的人头上爬过去，把她们从地狱送回了人间。

我怀念你们——永远年青的大哥哥大姐姐们！在那九死一生的关头是你们把死亡留给自己，把生命给了我们。我为你们感到无比的悲哀，你们那曾经充满理想和热情、曾经年轻而俊逸的生命却在一个酷热的日子里莫名其妙地迷失了。☞（本文选自网络）

第七章 “王关林”垮台、造反兵团恢复活动与“9.7事件”

8月底，好消息传来：王力、关锋、林杰等被抓了！大家闻讯精神大振，连夜讨论造反兵团恢复活动事宜。

王、关、林倒台的消息在北京不脛而走，各高校群众组织很快做出反应。北师大井冈山与一些地派组织被打懵了，他们不能接受这个事实，第一反应就是发声明抗议。9月1日

晚，谭厚兰在北师大革委会会议上坚持说“林杰是坚定的革命左派”。会后，谭厚兰率领师大“井冈山”一部分人到红旗杂志社游行示威，表示支持林杰。

同日，师大“井冈山”发表《关于目前形势的严正声明》说：“运动以来，一些别有用心的家伙一直把林杰一关锋一康老，说成是一条黑线，妄图分裂中央文革，动摇无产阶级司令部，扼杀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一罪恶活动早已遭到了可耻的失败。可是，最近这些家伙又重新拾起了这一法宝，明目张胆地对抗中央文革首长的指示，孤注一掷，大搞政治赌博，继续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并妄图借此搞垮“井冈山”红色政权，我“井冈山”公社全体社员和全校革命师生员工坚决不答应！谁反对中央文革，我们就打倒谁！”

而新北大井冈山公社、清华井冈山“团派”却高调表示庆祝，他们原来就与谭厚兰有矛盾，现在则公开亮出了支持北师大造反兵团的立场。这些组织商定派人出席9月7日北师大造反兵团恢复活动大会，表示祝贺与支持。

9月7日凌晨，我急着跑回我们活动的教三楼报告一个消息，不小心掉进一个没有井盖的窖井，腰部受了伤。因为兴奋我也顾不上伤痛，想到早上兵团恢复活动大会一开，一定会有人要求参加造反兵团，于是我就开始赶印申请加入兵团的报名表。天亮以后，陆续有人来索要报名表，可是，突然人群蜂涌而来，新印出的二百份报名表一下被抢光了，我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后来知道，谭厚兰组织内有人倒戈了，井冈山公社三个常委樊立跃、黄家林、李五全成立了一个“专政委员会”，一大早上把谭厚兰揪到师大大操场上给斗了，他们还要拉兵团参加。此时大操场上已经挤满了各高校群众组织派来支持兵团恢复活动的队伍，等着大会召开。但是“专政委员会”的人占据着主席台正在斗谭厚兰，于是兵团一位负责人上台宣布“兵团不参加‘专政委员会’”，并请他们把主席台让出来。

原来是揪斗谭厚兰的行动引发了井冈山公社的倒戈大潮，连谭厚兰的秘书都站出来揭发谭。人们纷纷上台声明加入造反兵团，为了怕落于人后，有的干脆以整个系的名义集体加入。

岂料当天晚上形势又一次大变，不过是向相反的方向变。

7日晚七点左右，中央文革小组紧急通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坚决反对开群众大会斗谭厚兰，反对搞垮师大革命委员会，谭厚兰和师大革命派在二、三月反对谭震林是完全正确的，我们支持他们的这一行动。你们应当立即释放谭厚兰同志。希望你们严格执行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路线，提高革命警惕性。”

随后，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转达周总理、中央文革指示：

(1) 北师大的革命委员会、“井冈山”是革命的组织。谭厚兰是革命的，如有错误可以进行批评与检讨。

(2) 不能搞垮革命委员会与“井冈山”的革命组织，不准揪斗谭厚兰，不能限制她的自由，召开群众斗争大会是错误的。凡属于被抄的一切公私物品一律归还。以上指示由原革命委员会贯彻执行。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亦发通告：

(1) 北京师范大学，今天在个别别有用心的人操纵下，擅自推翻师大的革命委员会，非法绑架和斗争谭厚兰与师大革命委员会的委员。这些作法都是完全违反中央六六通令，完全违反中央负责同志最近的讲话精神的，现宣布无效，并立即恢复原来的师大革命委员会的一切权力。

(2) 樊立跃等人自己组织的专政委员会是非法的，应立即宣布解散。

(3) 樊立跃、黄家林、李五全三人拘留审查。此命令通报全市各革命组织。

据康生说，北京市革委会的通告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

谭厚兰惊魂稍定即反过手来，企图鱼目混珠借机把兵团整垮。

当晚，谭厚兰在“7·27 广场”召开大会，表示拥护中央文革紧急指示、北京市革委会通告，声讨“专政委员会”罪行。并说造反兵团是“一月风暴反夺权的逆障”、“二月逆流的怪胎”、“颠覆红色政权的急先锋”、“专政委员会的罪恶帮凶”，是“一伙反革命小爬虫、变色龙”。

可是她也只能陷于谩骂，拿我们没办法，因为无论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紧急通知，还是北京市革委会的通告，其中说到的那些事——成立专政委员会、揪斗谭厚兰、推翻师大革委会等，根本与我们无关，我们只是庆祝“恢复活动”而已。不过我们也深感奇怪：在那么混乱的情况下，兵团竟没有被“一勺烩”，到底是谁保护了我们呢？

经过“9.7事件”，兵团人数从十几个人一下子增加到几千人，经过不到12个小时，又从几千人退回到几百人——原来潮水般涌进来的人，又潮水般退了回去——这个充满戏剧性的事件让我实实在在体会到什么叫“群氓”。虽说已经有了几百人，各系都有了一支队伍，但和谭厚兰的几千人比，还是差得太远。不过谭想吃掉兵团一时也办不到，双方处于僵持状态。

第八章 兵团“倒谢”与“712事件”谭厚兰放火烧楼

1968年1月，王关戚中的戚本禹也垮台了，而戚本禹就在几天前的1967年12月27日与谢富治一起接见师大群众组织负责人时是一边倒支持谭厚兰压兵团的，这让兵团的人益发觉得自己坚持反对王关戚的斗争是正确的。

1968年春节，颂平回上海看望父母，此时她父亲已因思女心切而致中风偏瘫两年多。

3月初，又有一件破天荒的大事发生，北京市革委会突然通知造反兵团派人参加北京高校群众组织学习班，而且与谭厚兰的井冈山公社各出3个人，3比3，对等！这可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过去不但不承认兵团，而且把兵团打成“无政府主义”“为二月逆流翻案的保守组织”，现在突然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实在让人惊诧莫名。

说实话，一直到今天我们也弄不清这是怎么回事。不过，我们总是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似乎有人在暗中保护我们，是周总理吗？无法确证。但也有一些事不能不让人产生某种联想。比如前边说的“9.7事件”抓人只抓谭厚兰方面的三个常委而不抓我们，再比如同年稍

后发生的“712事件”——谭厚兰利用北京高校发生武斗之机，围困兵团所在地工五楼，断水断电、放火烧楼，中南海消防队赶来灭火，给我们留下喝的水，还帮我们往外带给中央的告急信件。

还有一件事应该更有说服力，那就是文革后，同我们一道被抓被关的青年教师许嘉璐竟当上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提拔一个普通教师到那么高的位置凭什么？许没有任何显赫的家庭背景，有的只是文革中与我们一起为保总理、反谭厚兰及其黑后台王关戚而倒霉的经历。1984年第一个教师节庆祝大会在北师大召开，邓颖超代表中央出席，当时是许嘉璐代表全校师生上台发言并接待邓颖超的，而许嘉璐又是颂平平反后推荐给当时北师大党委书记方福康的。之后，许一路攀升，从中文系主任，升到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又升到国家语委主任，再进入民进中央任副主席，1997年则接替雷洁琼当上了民进中央主席，后又当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如果许没有在文革中保周总理的经历，这一切可能吗？

更有意思的是，八十年代中期，颂平在警官大学二系要提副主任，那种单位没党籍怎么成？于是就提出申请入了党。一次去许老师家说起此事，许老师让颂平把入党申请书留一份作参考。没想到，当年在师大许老师被隔离审查时的看守所校现在成了党小组长，许想入党他这一关就过不去。正在此时，中央统战部来人，说这个党你不用入了，你入那个民进党吧。

我还清楚记得，许老师当上副委员长后请我和颂平到家里作客，见面我说的第一句话是：“没想到一觉醒来，许老师当上党和国家领导人了！”

接到参加学习班的通知，我要颂平赶紧回北京，这样的机会怎么能错过。

在北京市革委会举办的学习班上，中央文革曾于3月5日、3月11日两次接见群众组织代表。3月5日晚的接见，北京高校各群众组织负责人公推颂平第一个发言，大家可能是觉得造反团受压大久了，该有出头机会了。颂平发言历数谭厚兰干的坏事，引起江青的不满，说：“你就是王颂平啊，我可认识你了，我今天不和你谈。”江还说：“你不要满场指责，满场指责不好。”

王力、关锋、戚本禹一个一个都倒了，和他们关系极为密切、一直和他们唱一个调子打压兵团的谢富治就成了首当其冲的人物，社会上开始风传谢要垮台的消息。3月16日，社科院学部一直反王关戚的群众组织总队率先贴出《打倒谢富治》的大字报，3月18日北师大造反兵团有人贴出《把反革命两面派谢富治送上历史的断头台》的大字报，“倒谢”开始了。

岂料没过几天形势又来了一个突变。3月27日，中央文革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万人大会，毛泽东亲自出席，林彪讲话，不仅保了谢富治，还把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三人打成“为‘二月逆流’翻案”的反党集团。这下子可好，兵团立马被置于风口浪尖，岌岌可危。谭厚兰当然不会放过整垮兵团的良机，开动全部宣传机器，大造“杨余傅是兵团黑后台”的舆论，必欲把兵团打成反革命组织，为此，他们私下里炮制了一大本黑材料，把兵团中许多人列入“反革命”的黑名单，我当然也在其中，承蒙抬举，被冠以“宣传部长”的头衔，其实，兵团里还真没有这些官衔。

形势又一次让人陷入困惑，但兵团战士就是想不通：王力、关锋、戚本禹、谢富治这几个人，为什么坏事他们都是一起干的，有人就是黑的，有人就是红的？为什么有人已经垮台了，有人却能屹立不倒？想不通就不能轻易认错，坚持真理也不能怕孤立。因此，没有出现退团潮，大多数兵团成员仍然选择留在兵团里，这些人都是兵团的骨干。

1968年的夏天，北京一些高校出现了武斗的情况，北大、清华都在其中。这两个学校都有两派，力量对比不太悬殊，谁也打不垮谁，矛盾于是愈演愈烈，一直发展到企图用武力消灭对方。北师大不同，谭厚兰有几千人，兵团只有两百人，其中大部分人还住在原来班上的宿舍里，只有几十人住在工五楼。这个工五楼原是讲师楼，不像那种筒子楼，而是单元房，里边有卫生间，甚至还有洗澡盆，条件不错。谭厚兰曾经在这里关过不少所谓要审查的重要人物，我见过的就有两个，一个叫王学文，原财政部副部长，把他弄进来，是为了从他嘴里搞到打倒李先念的材料。还有一个是胡风的妻子梅志，看上去是一个很不起眼的矮小干瘦老太太。

在这样一种武斗风起的形势下，谭厚兰他们觉得这是个一举搞垮兵团的好机会，于是就在7月12日这一天开始动手。

在这之前，借兵团“倒谢“失败、杨余傅倒台之机，师大井冈山已经将工5楼的窗玻璃全部打碎。工5楼共4层，南北走向，工4楼、工6楼东西走向，分别在工5楼的南端和北端，3座楼成品字形排列。工4楼、工6楼共6层，比工5楼高，楼顶是平台。谭厚兰命人在这两个楼顶上架设用自行车内胎做成的强力弹弓，拿石块当炮弹向工5楼发射。这种强力弹弓威力很大，窗玻璃当然不在话下，我们拿木头床板挡在窗口，一颗石弹打过来，一寸厚的床板应声折断。即便这样，我们仍然坚持在这里。

他们还有一个办法，企图用毒打迫使我们屈服。工五楼离吃饭的食堂有几百米的距离，你要去吃饭，他们就派人在半路上截住打你。我们中不少人已经上了他们的“反革命”黑名单，不能出去吃饭，就得有同学帮助他们代打。

我虽然也在那个黑名单上，但我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加上我以为我平常并不太出头露面，他们只有上层的人认得我，于是我每天照常去食堂吃饭。不料，还是被他们盯上了。一天中午，我一进北饭厅就和他们一个头面人物打了个照面，我知道要有麻烦了，没打饭就赶紧离开。北饭厅出来就是一条东西向的马路，过了马路就是绿园，斜穿过绿园就快到工5楼了。没想到我刚走出北饭厅，几个家伙就围了过来，两个人抓住我，背后还有一个，我不知哪来那么大力气一下子挣脱了转身就跑，刚跑到马路上就被追上了，一阵拳打脚踢。我是真佩服这帮家伙打人的本领，他们只须一个扫堂腿，你就一下子摔倒下去，你刚爬起来，又是一个扫堂腿，你又是一下子摔倒下去……动作那叫一个干脆利落。我被打得头晕眼花，背心也撕破了，浑身都是泥土……这时兵团一些同学拉着一个军宣队员围上来，齐声谴责那几个家伙，然后扶着我走回工5楼。说起来也真奇怪，也许是气顶着，从始至终我都不知道疼。后来1971年“426事件”兵团全体被抓到怀柔时我曾跟着绝食3天，自始至终也不觉得饿。我只能感叹：人的神经真是个很奇妙的东西。回到工5楼后听有的同学说，中文系军宣队里一个叫“大老刘”的对那些打人的家伙说‘谁让你们在那儿打？都让

人看眼儿里去了！”意思是对兵团的同学可以打，但别当着众人的面打。这就是军宣队的真实态度。

看我们还是不屈服，他们又使出了断水断电的毒招。电没有在当时还不能一招致人于死地，无非是白天热、夜里黑，可以挺过去，可没有水那就要命了。这时候不知道是谁想出了挖井的主意。

北师大那块地方叫铁狮子坟，地下水位肯定特别低，还得打穿工5楼的地基，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既没工具，也不懂技术，可兵团里几个男生硬是靠一把铁锹挖下去13米，而且真就挖出了水！这一天是7月9号，他们在墙上写下几个大字：沉淀三天。

三天后正是7月12日。这天一早，谭厚兰命人在校门口贴出告示：今日校内有活动，恕不接待。然后集合队伍把工5楼团团围住，他们管这叫“关门打狗”。这时候，谭厚兰的得力干将、北师大革委会委员黄贵贤打着谈判的旗号带了两个人进了工5楼一单元的门，上到半层楼梯转角处时被我们拦住了。

由于形势日趋紧张，从西北方向北大、清华那边不时传来枪声，已经动用热兵器了，我们这边也不得不做一些准备。为防止攻楼，我们把暖气管子斜槎儿锯断，当成标枪，暖气片则放在窗台上，防止攻楼。在楼梯转角处我们用几根长木头交叉捆绑，以防止人一下子涌上来。另外准备了一些石灰包，近战时用得着。

黄贵贤等人从交叉的木门低头钻进来时我和几个兵团战士正好就在那里把他们拦住，狭窄的楼梯转角处一下子挤满了人。我一看，不好！如果他们一人搂住我们一个，后面的人马不就可以挤进来了吗？那工5楼失守就是旦夕之间的事！

必须马上把他们撵出去！一瞬间我就做出了决定，一声口令：打！楼梯上兵团战士手里早就攥着的石灰包噼哩啪拉甩向黄等，趁他们被打得晕头转向我们一齐用力把他们推了出去，然后堵死了进口。

企图用欺骗手段把工5楼拿下的阴谋破产，谭厚兰等的狰狞面目就彻底暴露了，他们集结队伍开始攻楼。

后来看到《参考消息》的报道，被中国的所谓“红卫兵运动”所鼓动，东瀛之国日本也闹起了红卫兵，东京大学的学生占领了东大安田礼堂。日本政府决定把学生赶出去，他们动用了机动队，使用建筑上用的铁马做掩护，打穿墙壁冲了进去。据合众国际社东京十九日电：“数以百计的学生被押了下来，他们被戴上手铐或举着双手，其中许多人脸上和眼上扎着纱布。”

日本著名女作家新井一二三在《我们这一代日本人》一文中这样回忆道：“1968年，我上小学，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到了世界第三位的水准。同时国内纷纷发生公害案件，经济高度成长的反面效应逐渐明显起来了。大学生共鸣全世界政治潮流，‘全共斗’学运达到高潮，学运分子与警察机动部队在东京大学安田礼堂展开了两天的激烈斗争，最后375名学生遭逮捕。”

在攻打安田礼堂几个月前，比日本人还早，我们北师大谭厚兰的爪牙们同样也用了铁马掩护的办法，靠近了工5楼一楼凿穿了墙壁，进入工5楼后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我們挖的水井给填了。真是丧心病狂！

这还不算完。为了把兵团战士们逼出工5楼，黄贵贤们竟敢使出了放火烧楼的毒招！工五楼的坡形楼顶是木质结构，火真的烧上来不得了！

他们在一楼点火，对外却污蔑兵团在烧“黑材料”。后人可能都听不懂这里说的“黑材料”是什么意思，就是所谓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材料。可是，什么叫“无产阶级司令部”？什么叫“攻击”？说得清楚吗？听得明白吗？真是荒诞到了至极的年代啊！

谭厚兰在师大关起门烧工5楼，不仅楼里的人急，楼外的人更急。他们跑到天安门，贴出求救的大标语，没有浆糊，到文具店买的小瓶浆糊。真是菩萨保佑，中南海消防队真就来了！据说谭厚兰们开始想拦住不让进，但怎么拦得住？消防车靠近工5楼，悬臂升起，消防队员从4楼窗口进入，外边围观的群众一片欢呼。火是一楼放的，上边根本没有火。消防队员知道水都被断了，于是我们要找家什装水，可是水枪里的水很急，脸盆存不住，

见工5楼里有浴缸，于是就往浴缸里放水。一些消防队员很同情我们，临走时把我们向中央告急求救的信也揣进怀里带走了。

放火的阴谋又破产了。为了坚持长期斗争，我们还得把一楼夺回来！怎么办？我们把二楼楼板凿穿，用弹弓把他们撵出去，再把铁马上覆盖的铁板拽下来把被他们凿穿的墙洞口堵住。

这之后就是长达半个月的对峙。

有水了，但没有粮食。不解决这个问题，还能坚持多少天？

工5楼攻不下，兵团人也逼不出，谭厚兰们只剩下围困一招。于是他们无论白天黑夜严密封锁，夜里则加强巡逻。这里要说到谭厚兰的武斗队了，它的骨干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师大后勤系统修建队的工人，一部分是师大体育系的学生，这些学生当中有两个人打人特别凶狠，尤其可恶，因其一个黑，一个白，被称为“黑狗熊”、“白狗熊”。就是这些人组成了专职武斗队，每天夜里都要跑到距工5楼仅20米的教工食堂吃夜宵。这边厢工5楼漆黑一片鸦雀无声，那边厢教工食堂灯火通明酒足饭饱。夜深人静之时，楼外不时传来武斗队员拖着长矛在水泥地上走过划出的声音，用北京话说，听上去真是还挺疼人的。

兵团几位负责人紧急磋商，决定派几个人夜里突围出去弄粮食。7月16日这天后半夜，估计武斗队员们差不多睡着了，铁崇光、巩宁如等4个兵团战士手持长矛，从工5楼冲了出去。工5楼离东校门大概有近100米的距离，估计十几秒钟可以跑出去，但跑步声还是惊动了武斗队员，他们也手持长矛冲出来企图拦截，可面对兵团战士的凛然正气，只能虚幌一枪，不敢真搏。后来看到北师大外语系一位叫安希孟的同学写的回忆文字，他那天夜里刚好就在现场，他这样写道：

“1968年董连猛师长率领兵丁攻打北师大工5楼，夜晚值守防兵团潜逃。凌晨兵团同学(彼时叫战士)逃窜，我责问陈毅文同学为何不把暖气片推下砸死彼们，陈毅文说，‘朕于心何忍哉’。我刷地脸红了。这次‘倒谢’，史称右倾翻案妖风(迷雾)，又叫黑风，……

杨余傅被抓，造反兵团倒谢失败，龟缩工5楼，于是有了井冈山掌权一派712攻打包围工5楼一役，比林总包围长春，城里百姓不许出城一个麻雀也飞不出略显逊色，但井冈山革委会董连猛指挥武斗豪气干云断水断粮断电也不亚于林总。汽车轮胎制作强力弹弓向工5楼窗口发射，我初中学‘弹洞前村壁’如今被坐实。长茅剑戟发出寒光。……712武斗，他是攻打工5楼武斗前线总指挥，做了煽动报告，总动员令是他发出的。动员大会上，原武装部长大喊，‘踏平工5楼，不要啦’。那个武装部长煽动说他心情很沉重，中午只吃了五个饺子（∴笑）。三种人、北师大井冈山二号坏头头董连猛只识弯弓射大楼，亲拉强力弹弓，用石头射向工5楼。玻璃窗户几乎全部破碎。他们对工5楼断水断电断粮。膳食科一位工人每天吃饭时殴打脚踹造反兵团的同学。董连猛是师大头头，视而不见，纵容唆使。大卡车上按住彭德怀脑袋游街示众，曲阜砸国务院文物。”

这位安希孟同学我不认识，但从行文中可以看出其个性诙谐，回忆当年之事文字活灵活现，生动跳脱。多亏了它的回忆，让我们重温这段历史。尽管他有些观点我不能苟同，但他留下的这些文字比较客观，所以还是应该对他表示感谢，否则北师大文革历史简直就成了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一无所有了。你可以把是非评判先放一边，但你必须忠于事实。他所写至少证明了兵团是被害者，而谭厚兰董连猛等是加害于人者。

那么说到是非，并非一笔糊涂账。安同学其实也是个性情中人，他对同系的董连猛其人的品行不是深恶痛绝吗？为什么呢，因为董干了太多的坏事，而且为人太无耻，让人无法不恶深痛巨。

但是安同学却这样评论：“但平心而论造反兵团属于文革中省无联一类极端派。”在另一处又这样说：“两极相通，北师大文革诸派，只有大门石狮子是干净的(可惜北师大没石狮)。”

这里，安同学可能有些误会有必要澄清一下。

说“造反兵团属于文革中省无联一类极端组派”有什么根据呢？

我能想到的是，物理系68届一个名叫李文博的同学曾经贴出过一张大字报，题为《公社早已不是原来意义的国家了》。这件事，安同学文字中也有提到。首先要说明，李虽然和我们这些后来发起成立造反兵团的人很熟，但并不是兵团的人，这张大家报与兵团这个组织无关，也不代表兵团的观点。第二，这张大字报是怎么出来的呢？1966年10月以后我们一千人经常在一起议论形势，有一天晚上大家议论到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的论述，不知道怎么回事，第二天李的大字报就贴出来了，而内容刚好就是我们头天晚上所议论的，原来，李当时正在这个教室里一张体操垫子上蒙头睡觉，大家可能精神太集中了都没注意到他。这件事我们当时的反应就是：这么投机也未免太快了吧？然而就是这张大字报成了林杰利用人民日报攻击兵团的靶子。

除了李这张大字报，地理系四年级一位叫顾文选的同学也贴出过一张题为《大大改善无产阶级专政，大大革新社会主义制度》大字报。后来顾也参加了兵团，被打成“反动学生”，毕业后不给分配，送河北沙城部队劳动锻炼。文革后平反考研，在国家建设部工作一直当到司长退休，同学们现在跟他开玩笑还是叫他“改善”。好多年后我曾看到一个资料，1957年反右时与北大林昭同时遇难的有她一个同学，名字也叫顾文选，还有这样的巧合。

其实，兵团与湖南“省无联”毫不相干，如果从思潮倾向上细究起来，还是对立的，把这样的事安到兵团头上纯属“欲加之罪”，但不知者不怪，安同学不了解这个背景发出那样的议论情有可原，问题是他为什么又说：“北师大文革诸派，只有大门石狮子是干净的(可惜北师大没石狮)”的呢？

那么我就要请问了：兵团到底干过什么坏事？无论对公对私，有谁能够说出一件来吗？哪怕只是一件？

安同学在评论文革时这样写道：“文革惨烈是全人类，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劫难，那不是解放全人类，而是幽囚全人类及其人性。或者说，我们自己幽囚了自己，自己送自己上断头台。人有自杀自虐的本能。人生就是人死。生着，活着，就是死着——向死而生呀。

因了这段死亡的历程，所以就有了生的本能冲动——1976年的“四五”，这是中国20世纪后半叶唯一一次发自人民内心的真正的人民运动，是发自生命深处的集体呐喊，是继彷徨之后的二心，是求生的本能，是向死而生——面对死亡，却逃避死亡，追求和希冀生命。”

“2016年是文革浩劫50周年，应举办纪念活动，毋忘国耻，毋忘族辱，毋忘党羞，毋忘民愧，举办展览，血衣血裤，跳楼自杀之地应树白幡，武斗牺牲烈士广宣传，颁发匾额，以刘少奇为首的冤魂厉鬼幽灵列队游行，红卫兵大阅兵，毛司令天安门一挥手，百万大军旌旗奋风雷动把牛鬼蛇神打翻在地再踏一万只脚。上演窝里斗电影，田野车间再现红海洋。……”

我非常赞同安同学的评论，这样精辟而且凌厉的文字我自认写不出来，也深为钦佩一个人在痛定思痛之后仍然具有起码的良知与血性。既然这样，那我就要问了，造反兵团在文革中在北师大到底都干了些什么？不就是反对了谭厚兰和在其背后指使她干坏事的王力、关锋、戚本禹、林杰等人吗？你现在痛骂的不就是我们当年所反对的吗？我们不也就是因此而惹恼了他们背后的江青、康生而惨遭迫害吗？除此之外，请问，我们还干了其他什么事？或者说，有谁能说出我们干过任何一件坏事？哪怕只是一件？

而我们的对手谭厚兰在王力、关锋、戚本禹、林杰指使下干了太多的坏事，这里仅举“讨孔”一例。对此，安同学这样写道：

“1966年11月30日10时整，讨孔大会准时开始。主席台上坐着界限分明的两个阵营，红卫兵和工农兵代表坐在中央，西侧的桌子后边孤零零地坐着省委书记处书记栗再温和县委书记李秀。他们今天有两个任务：一是表态支持红卫兵的行动，二是代表省委和县委作检讨。谭厚兰首先讲话。之后，在震天的口号声中，参加了1962年孔子讨论会的余修、王众音、周予同、严北溟、朱活、王先进、高赞非等人被押上主席台示众。他们双手举着各自的牌子，上面写着他们的名字，名字上打着红叉。栗再温、李秀分别代表省委和县委作了检讨，承认前段时间对红卫兵的革命行动支持不够等等。谭厚兰作总结性的发言。讨孔指挥部副总指挥董连猛宣读通电全国《彻底打倒“孔家店”、捍卫毛泽东思想十点建议》。

最后，北师大红卫兵代表朗读了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宣读完毕，锣鼓齐鸣，口号震天。董连猛宣布：把牛鬼蛇神押上卡车，游行开始！向孔林进军，火烧孔像，刨平孔坟！装着孔子像的卡车来到孔林西边的小桥上，桥下已燃起熊熊大火，红卫兵高喊口号，把孔子像推进火海，大成殿的巨型匾额“斯义在兹”、“生民未有”……也被扔进了烈火中，同时烧掉的还有在孔府里搜出来的一些字画、书籍、牌匾等文物。”

知道“讨孔”造成了多么大的损失吗？

《齐鲁晚报》2014年1月9日《青未了》栏目这样写道：

谭厚兰“在戚本禹、林杰（亦说康生）授意下，以中央文革小组名义，率队200多人到山东曲阜造‘孔家店’的反。联合当地造反派派成立‘彻底捣毁孔家店革命造反联络站’，召开彻底捣毁孔家店的万人大会，砸毁国务院1961年立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发了给国务院的抗议信。在曲阜的29天，烧毁古书2700余册，各种字画900多轴，其中有国家一级保护文物70余件，珍版书籍1700余册；砸毁包括孔子墓碑在内的历代石碑1000余座，捣毁孔庙，破坏孔府、孔林、书国故址，刨平孔坟（经陈伯达批准），挖开第76代“衍圣公”孔令贻的坟（共破坏文物6618件），对其曝尸批判。专治经学的周予同教授被专程解押到场逼着亲自动手挖孔子的坟墓。押着当地各级领导干部和高赞非等参加过1962年‘孔子讨论会’的学者陪孔子塑像游街，称之‘为孔老二送丧’。

“李予昂，曾任山东省副省长。1980年5月中旬，他陪客人到曲阜访问，见到文物古迹惨遭破坏的景象，‘愤慨万分’，遂成诗一首：

万恶“四人帮”，十年逞逆狂。

少昊像颅碎，鲁故城拆光。

三孔大破毁，周庙受灾殃。

贼罪臭万年，历史诛巨奸。

首凶陈伯达，作伥谭厚兰。

留此残碑在，铁证代代传。

此诗刻在残碑上，真是别有深意。

“1978年5月7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视察曲阜时说：‘对破坏文物的首要分子要严惩’，‘谭厚兰破坏“三孔”文物该杀。’”

再举一个“斗彭”的例子，也是从安同学文章中摘录的：

“1967年，从7月26日开始，重伤中的彭德怀被北京航空学院、清华大学、解放军各总部、国防科委、三军直属机关和在京院校、人民日报社、北京师范大学、空军直属机关及空军在京院校、各文体单位、北京邮电学院等数十个单位连续“揪斗”。北师大批斗过的有罗瑞卿、彭真、余秋里、李雪峰、杨尚昆。批斗彭德怀时，还令其夫人浦安修陪斗。浦安修当时是北师大政教系主任。在北大，彭德怀被夹在大卡车上游斗。用巨手猛压他的光秃秃头颅的，是外语系的董连猛，井冈山二号人物。”

像这样的罪恶之事不该反对吗？难道反对这样的事反而有罪吗？

其实安同学是个有心人，对师大文革历史也是非常熟悉的，比如他对师大井冈山内部派别分化的历史就说得相当清楚：“谭厚兰麾下的井冈山战斗团内部的南北两派是这样的：井冈山的元老们，大多是有思想有见识的敏感的一批优秀学子，他们自觉造反，最先组建井冈山战斗团。但1966年冬井冈山内部大辩论大分化。最早的井冈山战士最有思想。有保姆的左派谭厚兰不能容忍他们比自己更有能力。他们退出（后来组建井冈山造反兵团）。北师大井冈山造反兵团也叫井冈山，为嘛？因为当初北师大井冈山战斗团就是他们始作其俑，谭厚兰上山后翦除王仑王佐们火拼他们，董连猛当初还在伪红卫兵师任军职。王颂平李先华蒲寿章等井冈山‘元老们’被赶下山，只好另立井冈山造反兵团。没有退出的，就是后来的南派基底。即使如此，井冈山内部依然有一批元老不满于谭厚兰的无能。1967年春，有一天，北师大大字报中心区道路两旁分别张贴两份长篇大字报声明，观点截然对立。从此就有了南派北派。南派是反对派。这一派1967年冬延伸为“大海航行靠舵手联合编辑部”——一个松散的小团伙。发起人中文系张梦阳先生，如今是鲁迅研究达人秀，中国社科院文学所。井冈山内部的反对派，便具雏形。”

这段话说得真是太有见地了，问题是被称赞为“有思想有见识”的这些人后来一直坚持做正确的事即便被打成反革命依然不肯屈服，何以反而跟谭厚兰、董连猛之流同样要被否定呢？洪洞县里没好人？那样说，这世界上还有起码的公道可言吗？

如果当年因为不清楚而那样说，时至今日还能那样说吗？应该不会了吧？

其实不必说更多的了，我只想提醒一点，那就是，当年大出风头的主要高校学生领袖在文革结束时都进了监牢，他们各有各的问题与责任。但是平反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北师大造反兵团的王颂平。这样的结局，有谁能说不公平吗？

一个世界，如果是非颠倒，黑白不分，那这个世界还有好人的活路吗？

不过，对安同学文中有一点说法需要纠正，他说：“被包围在楼内的井岗山造反兵团官兵弟兄们哀怨歌声‘抬头望见北斗星黑夜里想念毛泽东想念毛泽东’哀婉动人。在他们，一定动容，忧容惨淡，长泪汨汨，但中南海毛，肯定吃了安眠药长睡了，不曾听见。”如此描写就有点想当然了，兵团同学的精神状态根本不是他想象的那样悲悲切切，相反，倒是很有点同仇敌忾、众志成城的意思。

回到被围困的工5楼。

铁崇光等冲出师大，跑到北大，其间谭厚兰的人开车追赶，有22路汽车司机师傅临危相助将其甩脱，……铁崇光等弄回来七、八十斤粮食，主要是玉米面，我们拿玉米面与楼外摘下的槐树叶混合做成乒乓球大小的窝头，每人分吃一两个，这种小窝头黑糊糊的，味道苦涩，很像“忆苦思甜”时吃的食物。为了节省，喝水也是拿一个茶缸，一人一口大家传着喝，有点儿像电影《上甘岭》里那样。

就这样一直坚持到7月27日。这一天，大批工人、解放军开到清华大学制止武斗，蒯大富认为这是个阴谋，竟下令开枪打死了工人，还要抓背后黑手。当天晚上，毛泽东与中央文革一千人召见了清华蒯大富及其他高校群众组织负责人，毛说：工人、解放军是他派去的，他就是黑手。接见中还提到谭厚兰对兵团断水断电的事，江青讲话中还对谭厚兰的

做法表示了不满，对兵团表示了同情。江青的态度令人不解，她真的同情兵团吗？其实这也正反映出文革中斗争的复杂诡异。

在此次召见中，毛泽东对谭厚兰说：“文化革命两年了，你那一个两百人的兵团也没解决得了，弄得你睡不着觉，你暂时还不能走，你是女皇啊！……你要给他们粮吃，出入无阻，那些人也够惨的，‘省无联’式的大杂烩，还要搞反夺权。”

毛这里说的“他们”，指的就是我们，并且一语定了性：“省无联”式的大杂烩。

召见的第二天，谭厚兰的喽罗们就用大喇叭狂吼：毛主席说：造反兵团是是“省无联”式的反革命大杂烩！又在水泥路面上刷大字标语：毛主席说：王颂平是“反革命坏头头！一时疯狂得无以复加。

学生运动该退潮了。

北师大也派了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校，兵团也面临着下一步怎么办的问题。

其实一切取决于工、军宣队对兵团的态度。根据经验，过去在师大的当权者，从谭厚兰到军训团，从北京市革委会到中央文革都是压制兵团的，他们从来不承认兵团是革命群众组织，根本不承认北师大存在两派群众组织大联合问题，对兵团的一贯态度是必欲压垮而后快。现在的工、军宣队怎么样呢？只能听其言观其行了，兵团因此还在工5楼里坚持。两个月过去了，果然不出我们所料，无论是在公开场合还是在私下，工、军宣队始终不谈两派组织大联合问题，而是单方面要求兵团“回班闹革命”。原来这个工、军宣队与过去当权者们的态度一脉相承，这当然是不能接受的。

在北师大文革中，造反兵团这样一个普普通通没有任何人支持的群众组织始终坚持反对谭厚兰的倒行逆施，并因此招致打击迫害，但是为什么谭厚兰背后的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一个个都垮台了，事实已经证明兵团的方向是正确的，可兵团却连一个“革命群众组织”的名义都得不到呢？为什么就连参与大联合的资格都没有呢？

真的是有压迫就有反抗，压迫愈甚，反抗愈烈。兵团成员们决心用在工5楼继续坚持来讨一个说法：北师大造反兵团是革命群众组织，北师大存在革命群众组织大联合问题；这个问题一天不解决，我们就一天不离开工5楼。

决心固然大，架不住工5楼里只剩下区区几十个人，终于在11初的一天夜里，被工、军宣队几个人抬一个，抬回到各自的班里，然后宣布北师大“实现了大联合”。

可能在许多旁观者眼里，兵团这“一小撮人”太不识时务了，脑子太“一根筋”了，我的体会却是：兵团的斗争早已不是为了捍卫什么“思想”、什么“路线”，而是为了生存的斗争；而这为了生存的斗争，同时关乎正义与人格。

我必须承认，我们在很长时间里没有看清文革的实质——如果也能像一些先知先觉者那样睿智，我们可能早就激流勇退当了“逍遥派”——但当你拨开迷雾终于看清的时候，也正是黑云压顶、横逆袭来时，你会怎么办？这是对人格的严峻考验。在此，我觉得还是应该感谢我们从小所受的教育——既有革命英雄主义教育，也有传统的做人操守教育。

第九章 “清查516”与北师大的“一支一直”

转过年来，1969年4月，中共召开“九大”，毛泽东推出“六厂二校”支左经验，提出对群众组织要“一碗水端平”，这当然是兵团所欢迎的，于是重新集结起来。由于66、67、68届三届学生已毕业分配离开师大，所以好多宿舍楼都空了出来，兵团就占据了中南楼作为活动地点。

大联合仍然是我们的口号，而工、军宣队当然死死顶住绝不承认，这样，在很长时间里双方之间又形成了顶牛的态势。这时出现了一个十分奇特的景象：在全中国都没有任何群众组织存在的条件下，碰到有什么“最高、最新指示”发布，我们依然高举着“造反兵团”的大旗走在天安门广场上。

1970年初，从北京外语学院传来周总理关于“清查516”的一个讲话，我们通过中文系李金铠老师与北京外语学院章含之的关系弄到了这个讲话。

关于“516”，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是于1967年9月5日发表的姚文元的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后来有资料披露：这篇文章发表前经毛泽东8月20日、8月29日、9月5日三次修改，从标题到内容，最重要的是毛亲自加写了两段话：

“请同志们注意：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浑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所谓‘5·16’组织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以彻底揭露。

“这个反革命组织的目的是两个，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支柱——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个反动组织，不敢公开见人，几个月来在北京藏在地下，他们的成员和领袖，大部分现在还不太清楚，他们只在夜深人静时派人出来贴传单，写标语。对这类人物，广大群众正在调查研究，不久就可以弄明白。”

为什么周总理在这个时候提出“清查516”？到底背景是什么？这个问题直到今天我们也不清楚，但在当时这本来就是我们一直坚持的，听到周总理的讲话我们当然会觉得受到支持与鼓舞，于是在校内公开打出了要求“清查516”的口号，同时要求工、军宣队承认犯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

工、军宣队先是顶住不理，顶了几个月之后，5月的一天突然召开全校大会，承认在“清查516”问题上犯了“右倾”错误。

而兵团当中有些同学却不满意宣传队检查的调子，坚持要宣传队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1970年6月18日，又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发生了：宣传队再次召开全校大会，检查自己犯了“严重右倾错误”。工、军宣队负责人在讲话中竟然还有一个特别出人意料的提法，他说：“长期以来，在北师大存在着一支一直同王关戚斗争的力量，……”

这“一支一直”力量说的应该就是造反兵团，这样说确实符合事实，但在过去是绝不承认的，现在为什么突然这么说？这180度的大转弯究竟是怎么转过来的？宣传队自己肯定不愿意这么说，究竟发生了什么迫使宣传队不得不这样说？种种疑问无人为我们解答。

这样的形势前所未有，大大鼓舞了人心，但是兵团内部，包括支持兵团的“大海”内部，也因而产生了一种强烈情绪，那就是必须让宣传队公开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宣传队则在这一个问题上死死顶住，再也不肯退让一步。

这时，可能轮到兵团犯错误了。有些同学不懂得适度妥协的道理，不但坚持要宣传队检查“路线”错误，还跑到北京市革委会门前静坐，要求负责人接见。直到市革委会主任吴德接见后，静坐才结束，但兵团并没有争取到更多的东西。

而宣传队见兵团还不肯妥协便改变了策略，他们把谭厚兰弄回学校，召开全校批斗谭厚兰大会。王颂平被安排第一个发言，岂料王颂平刚上台，还没开口说话，蒲寿章就跳上台，抢先说：“兵团是全国最后一个山头，……兵团对抗工人阶级领导……”耐人寻味的是，工宣队长王强顺水推舟借机宣布大会不开了。兵团的人上台抗议，王强说了这么一句话耐人寻味的话：“蒲寿章是你们兵团的头头。”宣传队与蒲双方配合得真可谓天衣无缝。

蒲寿章何许人也？他是我们中二(2)班的同学、造反兵团原来的负责人之一。1966年10月，就是他带头写了题为《接班人宣言》的大字报，信誓旦旦地表示要“一辈子扎根农村干革命”。他说“一辈子”，其实连一个月都没坚持到。早在斗陶兵团时期，他与我们大家就开始疏远，宣传队刚一进校，他就贴出了一张大字报，指控王颂平与谭厚兰“殊途同归”，指控兵团对抗工人阶级领导，搞山头主义；而他要回班，接受工人阶级领导，……这之后他进了整党领导小组，国庆节上了天安门观礼台，……(此人在若干年后写了长篇文

字，对北师大文化革命做了诸多歪曲事实的描述。我因此写了《你要战，那就战》做了回应。详见本卷末附录九《你要战，那就战》——笔者注）。

这之后宣传队又召开一次全校大会，负责人在讲话中竟然提出“一个巴掌两边扇，黑手两边插，‘5, 16’两边抓。”

这是个极其危险的信号，预示着对方对待兵团的政策与策略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它等于告诉兵团：他们要对兵团动手了！此前出现的某些似乎有利于兵团的态度与我们所不了解的上层斗争有关，比如，周总理的态度一强硬，他们表面上不得不往后退一退，仅此而已。

10月，军宣队政委丁元祯找颂平谈话，主旨还是拉颂平与宣传队合作，同时明确发出威胁之辞，说：你不要以为我们拿你没办法，我们手里关于你的材料有这么厚一摞，……一边说一边用手比划着。颂平当然不会接受，谈话不欢而散。

为什么可以一下子变成“一支一直”？为什么又可以从“一支一直”一下子变成这样？变化如此迅速如此诡异让人完全无法理解，但从直觉上就能判断出什么才是宣传队及其后台的真实意图：对兵团手法可以变来变去，但归根结底是必欲除之而后快。

这时宣传队甩开兵团，在各系各班利用谭厚兰原来的人马纷纷成立专案组，开始抓“516”了。

10月某一天，召开全校批斗“516”大会，当场宣布逮捕了谭厚兰的作战部副部长数学系出69届学生王瑞龙，气氛非常紧张。随后，各系各班都把谭厚兰的一些骨干隔离起来批斗，一时间，鸡飞狗跳，又有人开始自杀。

自杀这种非常现象，与文革伴随始终。死的是什么人都有，还被安上各种罪名：干部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教授是“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历史反革命”，学生是“516”，……等等；死法是怎么死的都有：有上吊的，有跳楼的，有跳水的，有吃安眠药的，有摸电门的，……等等，我都一一见识过了。

兵团不参加这种显然会导致扩大化的群众运动式“抓516”，这个态度是正确的，但有些兵团成员认为宣传队“抓516”是假、包庇是真，还有人担心他们的批判会如果开成了兵团就要被甩在一边，于是，就去冲击宣传队组织的批判会。这种做法其实很蠢，我自始至终是坚决反对的。

果然，宣传队抓住兵团冲批判会的口实，反过来攻击兵团，使兵团处于被动地位。双方继续僵持，直到1971年的“426事件”发生。

第十章 1971年北师大“426事件”造反兵团被一网打尽

1971年北师大“426事件”发生。

4月25日夜，北京卫戍区派出两个营的兵力，将北师大中南楼团团围住。26日凌晨2时许开始行动，将住在这座楼中的学生全部拖出来，塞进停在学校围墙外面的汽车里。由于被抓的学生中还混有兵团之外的人，由所在班级的工宣队拿着名单，打着手电把该抓的人一一指认出来。天还未放亮，车队开动，车上的人不许抬头，否则将遭到粗暴的喝斥与按压。车子究竟开向何方，无人知道。大约不到一个小时，车子开进一座军营，把抓来的学生4人一组塞进一间间营房。

事件发生这一天的前半夜，我一直在写揭露“422事件”真相的大字报。所谓“422事件”是指4月22日这一天晚上，北师大工人、解放军宣传队以“五·一大清查”的名义要强行搜查我们所集中居住的中南楼，其真实目的是为了抓捕颂平，在我们抵制下没有得逞。4月25日约莫后半夜两点多钟大字报写完了，物理系69届一个叫陈纲伦的同学和我交谈了几句，我对他说，一定要加小心，他们上次来没有得手是不会甘心的。陈说，不会吧？这楼里住那么多人呐。我说，一定会的。分手后我担心有事，没敢脱衣即躺下准备休息。时间不长，只听见楼里一阵喧闹，我明白是他们动手了。我赶快穿上鞋子走出门外，只见满

楼道里都是穿绿军装的军人，我冲到楼道正中，看见正对楼梯的地方排着十几个女兵，我明白这是专门对付颂平的。我想冲到楼外去，被两个军人推搡回来。为了让各个房间的同学有准备，我大声喊叫起来：解放军要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解放军要爱护人民群众！几个军人冲过来就往外拖我，他们越拖我越喊，一直被拖出楼外，拖到大街边塞进停着的汽车里。大概又过了一个小时，天还没亮，听见车外有人压低声音问：楼里没人了吗？一个人都没有了吗？还有人举起手电往车里照。我知道他们没有抓到颂平不甘心，但颂平根本就不在楼里，他们当然抓不到。后来知道，兵团这个组织除了79个学生被连锅端外，还有5个老师、3个工人被抓，只是他们都关在师大校园里面。

车队开进了一个有哨兵站岗的大院子，因为路上不许抬头，所以根本不知道到了什么地方，后来知道这里是北京远郊怀柔县庙城卫戍区3师7团的营区。然后把我们4个人一组塞进房间里，我一看巧得很，和我一组的除了原来与我同睡一屋的历史系69届学生杜桂龙外，还有一个正是那个睡前与我交谈的陈姓同学，我们二人相视一笑，同时说：争论可以结束了。折腾了半宿筋疲力尽，我从衣袋里摸出唯一的一块奶糖，分成4份，每人吃了一小块。

天大亮了，被关押的学生不约而同地吵嚷起来，因为房间并未上锁，最后竟然都冲了出来，在操场上聚集起来。大家围坐在一起，秩序良好，议定向部队提出两点要求，一、承认我们是革命群众，二、发给我们毛主席著作，如果不答应就全体绝食。我其实是不赞成在缺乏充分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轻易绝食的，但我并没有提出反对——在当时那种气氛下，谁提出反对意见无异于背叛，众人的唾沫都能将你淹没。我没有提并非出于害怕犯众怒，而是因为我知道提也没用，还是走一步看一步吧。要求提上去没有人理睬我们，听到的是急促的哨声，军人们徒手集合以后向我们围拢过来。几个军人拖一个学生，伴随着一片哭叫声，学生们又被塞回房间，不同的是，一人一间。我明白，这是要各个击破。

绝食开始了。尽管我不赞成轻率绝食，但绝食即已开始我就不能破坏，我必须和大家一同行动。

每天早晨、中午、晚上都要送饭进来，我连看都不看一眼，默默地躺着，没有床，只有一张床板。北京的4月下旬，天气依然很冷，头两天只给了一件旧军大衣，后来换成了旧棉军被。饭可以不吃，水不能不喝，每天就靠几碗白开水顶着。3天3夜过去了，因为满肚子的气真称得上义愤填膺，我竟丝毫没有感到饥饿，只是觉得越躺浑身越凉。

房间外面的走廊里拉上了广播喇叭，每天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地播送毛泽东的《敦促杜聿明投降书》，制造紧张气氛。

3天过去再坚持已经没有太大意义，于是我当机立断改变策略，吃饭！我不能斗争刚刚开始就把自己赔进去。事实上我知道，单独隔离的手段已经发生作用，不少同学在威胁利诱之下已经陆续放弃抵抗，被集中到一些大的房间去了，开始与所谓的“坏头头王颂平”“划清界线”，“交待问题”。后来听说，中文系70届的何可栋同学坚持绝食了5天，最后不得不强灌葡萄糖。何，福建农村考来的学生，平时就有一股子认死理的犟劲儿，真称得上一条汉子！

每天派来对我们进行攻心战的一般都是两个人，一个军人，一个警察。第一次来我没等他们说什么，先发制人一口气说了两个钟头。人家还真有耐心，足足听了两个钟头，然后不紧不慢地就回了一句话：“小伙子，你什么都别说了；你要是好人，你能到这个地方来吗？”真是秀才遇见兵，人家这一句话里包含的逻辑简直太强大了，你根本无法招架！

我们没犯法，我们不能任他们随意摆布，我们要尽力与党中央取得联系，至少要把我们的遭遇让外界知道。我假意表示要写材料，跟他们要来笔和纸，埋头写出一份向中央反映情况的万言书。可是怎么弄出去呢？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我简直绞尽脑汁。我利用上厕所的机会已经看清楚了周围环境。我们住的军队营房，是50年代仿苏式建造的，一栋栋东西向长条形建筑，两排拱型房屋，南北有窗，中间是走廊，从一个大门出入。大多数同学已被集中到另外的地方，我近边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李国元，一个是王素莲。李是体育系70届学生，曾任过兵团负责人之一，在工、军宣队眼中应该算是比较重要的人物。王素莲是物理系70届女生，刚抓进来时，女

同学一共是四个人，就关在我的对门，现在此屋只剩下王一个。要把材料传递出去，只能设法与王联系上，王不是兵团头头，可能不是那么引人注目。怎么能把材料传到王手中呢？

苦思苦想多日后，终于有了！我们住的房间门窗紧闭，窗户玻璃都糊上报纸，糊到一人高，里外都看不见。门上有一块涂满红漆的玻璃，中央擦掉一小块漆，供看守往里窥视。天气渐热，为了通风，门框上边的小气窗支起来打开了一条缝。我对门外的看守报告说我要上厕所，得到同意后，我即抓起一件外衣往门外走，一边走，一边把胳膊往衣袖里伸，胳膊伸到头顶上时，手中攥着的纸团顺势就从王所住房间的气窗扔了进去，一般情况下看守不抬头往上边看，所以没发现。用这样的办法，我先与李联系上了，我在纸条上写了大意如下内容：他们真正的目的是要抓反康的反革命小集团，一般问题可以讲一些，这个问题一定要顶住。所谓康是指康生，中央文革的大人物，当时的政治气候，反对他，就是反革命。我怕李犯糊涂，意在提醒他一下，没想到，刚好把“罪证”送到了人家手中。

小条子可以传，万言书可怎么传？又是苦思苦想：有了。男厕所与女厕所在院落西头一个大房子里，只有一墙之隔，墙高过人头，但没封死。我去上厕所时刚好经过王素莲的后窗，我故意咳嗽一声，王听到了也要求上厕所，这样，我与王前后脚进到厕所，我乘机把万言书扔过墙去。看守是在门外守候的看不见里边，大功告成，我一口气松了下来。我想，形势一旦有所松动，王就可以把材料弄出去。没想到，我太低估“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了，我也没想到王会那样天真。

这之后，我苦思苦想的就是如何才能逃出去，因为我知道，他们正在全力抓捕颂平。现在他们把我们一网打尽，就是要彻底切断颂平与外界的一切联系，最后只能束手就擒。可是我即便跑出去了能帮上颂平多大的忙？对此我连想都没想，我就是一门心思琢磨着怎么跑。其实跑出去是根本不可能的，至少有三道关：门窗紧锁，房门口就有看守，大门口也有哨兵，营区门口更不用说了，当然是戒备森严。

一个月后，我彻底打消了这个念头，他们告诉我，王颂平已经抓到。王素莲天真地到营房大门口邮局寄我写的那份材料早被截获，而李国元则早已向他们交待了我与他传条子的事。

我没有想到，就因为这一个月高强度的苦思苦想，我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记忆力严重衰退加偏头疼，当然这是后话。

因为前边说到的原因，我一下子成了重点突破对象，在有意晾了我一段时间后又找我谈话，他们是这样说的：刚进来的时候看你就像个中学生，我们就没把你当回事，没想到所有的坏事都出在你身上。我很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他们终于认清了我才是除王颂平之外最主要的打击对象。信号是明白无误的：由于我的同伴的临阵怯懦，我已然被抛入极大的危险之中。为什么这样说呢？第一，他们要抓的所谓“有问题”的大字报，基本上都出于我手。第二、我出身右派，介入运动还特别深，是秃头上的虱子，明摆着自己送上门来的。第三、被抓以后不低头认罪，还组织人同“无产阶级专政”做斗争。一句话，找死呢！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我不能坐以待毙，我必须思考对策，断乎不能让他们置我于死地的阴谋得逞。

形势的确是极为险恶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与我那些顺风转舵的同学有关，让我怎么说他们呢？我并没企盼他们能为我遮风挡雨，但也绝没想到他们会那么快就低下了高贵的头。他们都是出身贫农，他们都曾担任过兵团的头头，曾几何时，他们还是那样的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然而当风云突变，雷电袭来之时，他们怎么就连一点招架之功都没有了呢？共产党对付敌人有太多的办法，其中一个就是分化瓦解。他们对那些出身好的同学说，你们出身好，根子红，只是一时糊涂被阶级敌人利用了。党的政策是“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你们只要反戈一击，党和人民欢迎你们回到人民的队伍里。就只是这么轻轻招一招手，我们那些根正苗红的无产阶级后代就乖乖回到了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反戈一击了。被他们反戈一击刺中的是谁呢？当然首先是王颂平，而在怀柔这里除了我就没别人了。

女同学中有一个叫王正志的，父母都是右派，但她不是头头，也不是主要人物，她其实更多是以同情我们的姿态出现的，抓人时她刚好在楼里，于是也一道被抓了进来。但说实话，这个王正志还真对得起她的名字：“正志”，她自始至终就不承认自己有什么问题。说起来这个王正志也是个人物，前文已经说到过，正是因为她，才引出了毛泽东关于教育革命的春节谈话。

我很快确定了对付他们的策略，那就是见步行步，且战且退，他们不是想一棍子将我打死吗？我无论如何不能让他们这一企图得逞。于是我从6月开始交待问题，既要交待问题，康生的事儿肯定是躲不过去的，而我们没干过任何见不得人的坏事，充其量不过是怀疑康生不是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而这种怀疑不仅有来由，而且仅限于私下里小范围的议论，就是把这些东西统统交待出来又能给我扣上多大罪名？即便扣在头上了，将来总有一天会分出黑白，我相信。就这样且战且退，从6月起至9月中旬，我跟他们周旋了三个多月。

被囚禁的日子里还发生了一件事。当时我们虽然被抓，但每个月46元工资还是照发的。在这里每月要交10几元的伙食费，剩下的就只能放在衣服兜里。从4月到8月四个月过去已经攒了100多元。但夏天到了，长衣服已经穿不住，特别是出去放风只能穿条背心，衣服都放在房里，结果有一次放风回来竟然发现衣兜里的钱全都不见了。谁干的呢？全封闭的情况下答案其实也不难找。领导把看守的士兵叫去谈话，三说两问就招了。那些从贫困农村来的兵什么时候见过那么多的钱？可能一时糊涂就做了错事。后来听说这个小兵被复员回家了，这让我必里很不是滋味，仿佛是我自己做了错事。

为什么对人要单独囚禁？我在文革前看过有关苏联契卡领导人捷尔仁斯基的书，书名不记得了，只记得他在18岁时因为参加革命活动而被捕，对他就是单独监禁，他明白，单独监禁要面对可怕的孤独，其目的就是要摧毁他的意志，而他，绝不能让这种图谋得逞。

奥地利作家茨威格的小说《象棋的故事》，讲的就是精神的饥饿对人的摧残及祸害。

德国纳粹为了在精神上彻底摧毁故事主角、一位知识分子的人道主义、唯美主义和反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施行了一种非常特殊的刑罚，将他单独囚禁在一间斗室之中，隔绝所有的文化和交往，不许看任何书籍，不许听收音机，不准书写任何文章文句。虽然不打不骂，也不缺饮食，但这种精神的饥饿，使那囚犯几乎发疯。他为了免遭精神崩溃，冒着生命危险，在一次提审时偷了纳粹军官大衣口袋里的一本书。返回囚室取出来一看，竟是一本棋谱。他毫无兴趣，但味同嚼蜡也得啃此棋谱来填补精神上的辘辘饥肠，以免精神的堤防给完全冲垮。结果，他战胜了德国纳粹的阴谋。然而这种单调的自我对奕，而且是盲棋对奕，使他得了象棋疯狂症。出狱后多年，他一见到象棋就会突然疯癫起来。故事就是在一艘远洋轮船上，几位乘客偶遇国际象棋世界冠军，进行一场车轮大战比赛，引出了这则由于精神饥饿而成为象棋狂的悲惨故事。

文革后接触过一些曾被单独监禁过的老干部，其中一位后来官踞安全部副部长，他们告诉我，几年关下来人被放出来的时候，几乎都不会说话了，还有人精神失常。

我得庆幸我被押关的时间没那么长，而且我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所以最后只是落个记忆力衰退和偏头疼的毛病。

【附录四】

就 1971 年抓捕大批学生的北师大“426 事件”给周恩来总理的信

敬爱的总理：

1971 年 4 月在北京师范大学发生过一起大批抓捕学生的事件。我们对此事有怀疑，特向您作简要汇报。

1971 年 4 月 26 日零时，大批军警包围了北师大中南楼，按照师大宣传队提供的名单，将原属师大井冈山造反兵团的 77 名群众抓到怀柔庙城 4562 部队营房关押。其间大搞逼供

信，以种种不正当手段，胁迫他们承认种种罪名。原计划把这批群众转送通县劳动，林贼倒台后，于 10 月底 11 月初匆匆送回学校，但仍关押几名不放，直至 1972 年国庆。迄今为止，并没有抓出一个反革命。

有很多情况令人怀疑。例如：

这些群众被抓走后，师大宣传队负责人王强在全校“声讨”大会上说：同志们可以想一想，这么大的事，宣传队能决定得了吗？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能决定得了吗？

在怀柔，一个军队干部对被关押者说：这样搞是“经过黄总长批准的。”亦有“林副主席批准”的说法。林贼倒台后，师大宣传队的雷炳曾在怀柔说过：这回看来要翻过来。

在师大，宣传队第一把手丁元祯在全校大会上曾辟谣说：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林彪就暴露了，已经没有活动能力了，难道还能做出这样的决定吗？

我们认为，“426”大批抓捕学生的事件根本违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对无产阶级专政原则的粗暴践踏。在批林整风运动中，应将其彻底查清。

谨致

崇高的革命敬礼！

北京师范大学 许嘉璐 方延曦

1973 年 2 月 8 日

【附录五】

为平反北师大“426 事件”给中央领导同志的信

党中央领导同志（分送华主席、叶副主席、邓副主席）：

我们是北京师范大学 69 届、70 届毕业生王正志、王素莲，向您反映七年前在北师大发生的一起非法抓捕大批无辜学生的严重事件。

1971年4月26日凌晨零时，数百名军警包围了师大中南楼，随即按照师大宣传队提供的名单动手抓人。两三名军警抓一个学生，首先是一顿披头盖脸的拳打脚踢，然后将学生反剪双手，卡住脖子，坐“喷气式”，拖上警车，把与他们有不同意见的革命群众共79名，连夜抓到怀柔北京卫戍区4562部队关押监禁长达半年之久，直至“913”事件后，才不明不白匆匆将人放回师大。抓人时强加的罪名是“破坏51大清查”，事实上企图在这些群众中抓出“反康生、谢富治的反革命集团”。关押期间，某些人粗暴践踏党的政策，大搞逼供信，严重摧残了这些群众的身心健康，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后果。

事件发生后，某些人气势汹汹地声称：“抓人是黄总长（指林彪死党黄永胜）批准的”，“姚文元同志来过师大肯定了宣传队的做法”，这使人不能不怀疑此事件与林彪、“四人帮”的关系。

我们是这一事件的直接受害者，我们认为“426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是北师大文化革命中两条路线激烈斗争的必然结果。在北京市委某些负责人的支持下，宣传队在师大自始至终推行了一条颠倒敌我的路线，顽固包庇反革命分子谭厚兰，竭力压制、打击反对谭厚兰、保卫周总理的革命群众。当着他们的错误遭到群众的坚决抵制时，他们就精心策划制造了这一起大冤案，把持不同意见的革命群众全部镇压下去。

七年过去了，我们的祖国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到处呈现出一派春光明媚的景象，而“426事件”受害的革命群众的身上却仍然压着沉重的包袱。我们恳切请求党中央在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中，将严重践踏党纪国法的“426事件”黑幕彻底查清，使这一重大冤案早日得以昭雪，使我们真正得到解放。

祝您健康！☞

河北省乐亭县汀流河中学教师 王素莲

辽宁省东沟县教师进修学校教师 王正志

一九七八年七月二十六日

【附录六】**我们不能再沉默**

我们是北师大“426事件”的直接受害者，我们是林彪、“四人帮”及其爪牙谭厚兰的不共戴天的敌人，我们是原北京市委主要负责人在师大推行错误路线的不可逾越的障碍。

我们已经沉默7年多了！1971年春天发生的令人震惊的“426事件”使我们暂时沉默了，但是与某些人的主观愿望相反，真理的火种并没有灭绝，我们这些“426”的囚徒终于活到了胜利的一天，亲眼看到了“四人帮”及其爪牙谭厚兰的可耻下场。从1976年10月那难忘的一天到现在，又是两年过去了，古老的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然而我们师大仍然是死水一潭，桃源世外。这究竟是因为什么？震惊世界的天安门事件都可以平反，为什么师大“426事件”连碰都不能碰？

两年多了，我们所以一直耐心地等待，没有将师大问题公之于众，完全是为了照顾一些同志的复杂处境，我们不想让这些同志为难。但是，某些人却把我们的善意和忍耐视为软弱可欺。他们这样想，实在是大错特错了！

我们的忍耐是有限度的！我们心中愤怒的火山终有爆发的一天。面对着某些人死死捂住师大盖子的罪恶企图，我们责无旁贷地发出呐喊！

我们呐喊：为“426事件”彻底平反！

粗暴践踏社会主义民主，大批抓捕保卫总理的革命群众的“426事件”的黑幕必须彻底揭开，某些人精心策划这起骇人听闻的大冤案，要害在于扑灭师大的火种，保住师大这块篡党夺权的黑据点。“426事件”能否平反，不仅仅是一个为民伸冤的问题，它直接关系师大揭批查运动的前途，关系到党的十一大路线在师大的贯彻。“426事件”不平反，民心不泯，党心不容！

我们呐喊：打倒野心家、阴谋家康生！

康生与林彪、陈伯达、江青完全是一丘之貉。他们都是谭厚兰的黑主子，都是破坏师大文化革命的罪魁祸首。不揭批康生长期插手师大的罪恶，师大十多年来的路线是非就无从分清，师大的阶级斗争盖子就无从揭开。

我们呐喊：彻底揭发原北京委主要负责人谢富治、吴德在师大推行林彪、“四人帮”路线的严重问题！

谢富治、吴德在文化革命中忠实听命于林彪、“四人帮”，长期控制师大运动。他们先后派出的驻师大军训团、军宣队、工宣队，顽固支持和包庇谭厚兰，打击保卫总理的革命群众，欠债累累，必须彻底清算！

我们呐喊：师大一切有良心有正义感的同志们，站出来仗义执言，勇敢地真理而斗争！“最可恨那些毒蛇猛兽，吃尽了我们的血肉。一旦把它们消灭干净，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

十年前，我们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师大的胜利及林杰、谭厚兰的可耻失败》一文中曾经说过：“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

十年过去了，十年功罪，由人民来评说吧！

北师大革命群众 1979.4

【附录七】

敦促北京市委、吴德同志为北师大“426事件”彻底平反公开信

北京市委、吴德同志：

“四人帮”已经粉碎两年多，抓纲治国，深入揭批“四人帮”，形势大好。但是运动发展不平衡，北京市委，吴德同志对牵涉到北京市的许多重大事件讳莫如深。

北师大——林彪、“四人帮”，在文革中苦心经营的黑据点，谭厚兰是忠实爪牙，在支持谭厚兰方面，北京市委不遗余力，功勋卓著。

北师大革命群众与谭厚兰之流的斗争，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在这场搏斗中，北京市委站在谭厚兰一边，镇压革命派，千方百计，不择手段，把造反兵团这个群众组织打成“保守组织”、“反动组织”、“‘五反一捣乱’组织”、“杨余付操纵的为‘二月逆流’翻案的组织”，等等……最终发展到1971年4月26日出动大批军警抓捕革命群众80余人，抓到怀柔关押，采用逼供信手段，大抓反康生、谢富治的反革命集团。

“426事件”发生至今快8年了，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的大好形势下，回头来看这一事件，对其反动性看得愈益清楚。这一事件的要害就是站在林彪、“四人帮”的立场上，镇压同其斗争的革命群众。手段的野蛮、卑鄙正是其政治上的反动性所决定的，没有真理，只能乞灵于反革命的暴力。

但是，北京市委拒不为受害群众平反，据说他们有很多理由：

“你们有来头。”请问：我们有什么来头？时至今日，我们有理由要求北京市委、吴德同志将其公之于众。

“你们有黑手。”8年过去了，我们有理由要求北京市委、吴德同志将这一黑手揪出来示众。

“你们有罪行。”我们在北师大反对王力、关锋、戚本禹、林杰等，确曾被谭厚兰视为“炮打中央文革”的“反革命罪行”，但历史无情，这一罪名于今安在哉？至于所谓反康生、谢富治，这在北师大确实是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文革10年的历史不是已经充分证明了他们与林彪、“四人帮”有着千丝万缕、不可分割的关系吗？革命的人们难道不是有相当的根据可以对他们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提出正当的疑问吗？盖棺未必能定论！

当前全国正在开展的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对解决师大问题有着极大的指导意义。林彪、“四人帮”实现篡党窃国罪恶目的的主要手段就是将毛泽东思想绝对化、宗教化。所谓“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所谓“紧跟”、“高举”、“大树特树”等等表面看来左

得不能再左的口号，正是用来掩盖他们反革命面目的障眼法。在这些假左真右的口号掩护下，他们肆无忌惮地歪曲、篡改、伪造最高指示，谁敢于抵制他们这样做，“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棍子就打向谁，谁就一定要倒霉。北师大革命群众在 10 年文革中可以说是饱尝了这种苦头。令人奇怪的是，时至今日，北京市委的负责同志仍然在耍弄“四人帮”的棍术，这就不能不让人多想几个为什么？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历史的主人。君不见，1976 年的天安门广场，对敬爱的周总理来说，是悼念的海洋；对万恶的“四人帮”来说，是愤怒的火山。我们要提醒北京市委、吴德同志，不要忘记历史的教训。人民的伟大力量是不可轻侮的。千秋功罪，人民终要说话。

是解决师大问题的时候了！

我们郑重敦促北京市委、吴德同志尽快为北师大“426 事件”彻底平反！

北师大 80 余名革命群众

1979. 4

【附录八】

关于北师大“426 事件”的报告

一、“426 事件”的背景

“426 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

在文化革命中，北师大广大群众抵制和反对谭厚兰在林彪、“四人帮”以及康生、谢富治操纵下，疯狂反对周总理，阴谋篡党夺权的罪恶，遭到谭厚兰及其黑后台的镇压，先后被打成“保守组织”“炮打三红”的“反动组织”。在 1968 年 7 月 12 日谭厚兰火烧工 5 楼的武力镇压事件中，大批群众被打成反革命，被抓、被打、被抄、被整……1968 年 8 月

宣传队进驻北师大后，在康生、谢富治授意下，继承了谭厚兰的衣钵，又把他们打成“杨余傅操纵的”，“为二月逆流翻案”的，“大方向错误”的组织。1970年“批清运动”开始后，宣传队又对抗总理指示，继续推行包庇谭厚兰、打击革命群众的错误路线，大搞神秘化、扩大化。师大群众坚决捍卫总理指示，把矛头对准谭厚兰的黑后台：康、谢，与宣传队的矛盾更加尖锐。

1970年6月18日，北京市革委会的主要负责人吴德等到师大检查“严重右倾错误”，以摆脱困境。8月13日，吴德在接见师大群众时，佯称他们反谭厚兰坚决，表示要同他们合作，并派出以卫戍区副参谋长李刚为首的联络组同他们联系。师大群众将计就计，坚持要进谭厚兰专案组。宣传队很清楚，群众的目的就是要追查林彪、“四人帮”及康、谢黑线，这不能不引起他们的极端仇视与恐慌。拉拢、蒙骗不成，又施以大棒。10月，宣传队即传出，吴德指示要给王颂平办学习班。群众认为这不是针对王颂平个人的，而是他们由来已久的镇压群众、掩护康、谢的真面目的大暴露。在群众的保护下，将近半年过去了，始终没有抓到王颂平。群众的斗争继续发展，形势对他们很不利。为了彻底摧毁师大反康、谢的力量，他们终于对师大群众下毒手了。

1971年4月22日，他们利用清查户口，精心策划了一起假案，将“破坏51大清查”的罪名强加在师大群众头上。4月26日即出动两营军警，将他们非法抓捕关押。

二、422所谓“破坏51大清查”的真相

1971年4月22日凌晨零时，师大宣传队不少人带着钳子、改锥等，声称查户口，到中南楼到处乱敲、乱砸寻衅。群众出面制止，引起争吵。当时即有人对宣传队直截了当指出：你们查户口是假，抓王颂平是真。你们如果有逮捕证，我们把人交给你，否则，就不要在这里胡闹。对这一点，师大宣传队始终装傻充楞，讳莫如深。尽管如此，他们仍然按照挑起事端以制造抓人口实的预定计划，派出大批人马到中南楼拖拉群众，有一个同学被倒拖双脚从二楼拖到楼下。冲突持续到凌晨4时许，宣传队见目的已达，突然全部撤走。

4月26日抓捕大批学生后提出的所谓的422“破坏51大清查”的罪名主要有3条：

1. 窝藏中央机密文件。事实上是当时广为传抄的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大字报。

2. 殴打、辱骂解放军。所谓“殴打”，纯属捏造；至于“辱骂”，可能是指那个被拖的同学哭诉说：他大爷当年被国民党抓兵时就是这样被拖走的。

3. 企图切断电源，制造事故。事实上中南楼电灯通宵未灭，上述指控不知从何说起。

事实早已证明，这些捏造罪状纯属诬陷。

三、“426事件”的经过

1971年4月26日凌晨零时，大批军警冲进中南楼，两个人一组将所有住在楼内的群众一个个拖架到楼外临时停靠的汽车上，让每个人写下名字，然后按照宣传队提供的名单留下，其余的人放走。为抓到王颂平，搜查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实在感到没希望了，才将79名群众（其中伙食科2人，许连友是派专车从顺义家中抓来的）连夜送到卫戍区4562部队在怀柔的营房关押达半年之久。其间以逼供信手段大整“反康倒谢”问题，企图从中抓出“反康谢”的反革命集团。至此，所谓“破坏51大清查”的骗局完全破产了。913林彪自我爆炸后，从10月30日至11月9日分3批将这些群众悄悄放回师大，少数同学继续在校内被非法隔离。

四、“426事件”与林彪、“四人帮”的关系

尽管“426事件”的背景至今不清楚，但不少迹象表明，“426事件”是林彪、“四人帮”以及康生、谢富治等人插手制造的。

1. 1971年8月在怀柔，一哨兵班长透露：这次办学习班是通过军委、林副主席批准的。

2. 1971年6月，一解放军排长在集中组讲：这次办学习班不是一般人决定的，是黄总长（指黄永胜）点头才把你们弄来的。这个话伙食科工人许连友也听到过，在师大校内亦有此类说法。

3. 中文系教师许嘉璐在校内隔离期间，听看守他的中文系学生马兴国说，“426事件”后，姚文元曾到师大来，表扬了师大宣传队，肯定了抓人的做法。

4. 生物系学生魏秀华曾在军宣队雷炳的笔记本里看到市委谢富治、吴德等人关于怀柔学习班的指示，内容为内紧外松，防止自杀、串连、逃跑等。中文系学生李德芳在怀柔听陈副师长说，他们每天都要向谢富治汇报。

五、我们对“426事件”的看法和要求

“426事件”规模大、历时长、整人多，在北京市是一个很典型的大错案、大冤案，它严重破坏无产阶级专政，野蛮践踏社会主义法制，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426事件”的策划者步北洋军阀、国民党反动派后尘，动用专政机关对付手无寸铁的青年学生，根本目的是为了保护林彪、“四人帮”路线，掩盖他们自己的反革命面目，这就是问题的要害。然而与他们的主观愿望相反，正是在这一事件中，他们野心家、阴谋家的嘴脸暴露无遗了。

我们严正要求：

1. 查清“426事件”的真相，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2. 依法惩办“426事件”的罪魁祸首；
3. 为“426事件”中所有受害群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消除影响。📌

北师大“426事件”受害群众

1979年7月1日

【本刊声明】

本 刊 声 明

《记忆》创设于 2008 年 9 月，是一份面向民间，面向业余，面向青年的同人刊物。

《记忆》非慈善、非公益。编者尽义务，作者无稿酬。凡认同本刊的宗旨，并取得会员资格者，皆可获得本刊。

《记忆》主张众生平等，凡摆事实，讲道理的文字，无论何门何派，皆可刊发。除特殊情况，《记忆》要求首发。所发文章，不代表编者的观点。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等内容，均受国家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未经著作权人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 xx 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联系：方惜辰

信箱：fangxc1966@gmail.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